



著庵黎周 集明清

行發社風宙宇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清 明 集

周 黎 庵 著



宇 宙 風 社 出 版



# 題記

在過去一年中，我寫了不少文字：應報紙副刊而寫的，大都是所謂『雜感』，因為有書店要出版，就讓他們災梨禍棗去了。為雜誌而寫的，雖僅僅只有幾篇，却有共同的性質，今將有遠行，恐不能再時有執筆的機會，於是想到也把它們印了出來；這固然是敝帚自珍，但也有點紀念的意思在內。

這裏所收的六篇文章，都是刊在宇宙風雜誌上的，除却第一篇是去年的作品外，其餘五篇，在雜誌上發表時而且有一個總題目，叫做明清之際讀史偶記，現在把它摘去了不用，因為我基本上不會在寫的時候讀什麼史；倘以讀史自命，我第一個先要笑自己，何況於讀者。

寫這些文章，固然是雜誌編輯先生逼出來的，一面自然也有我的意圖。



我覺得倘使以前在報紙副刊上那種『雜感』不能再寫的時候，用間接的方法來寫抗戰文字也是好的，那便是這些文字的成因。

夫『史』者，『鑑』也，歷史上的事實雖不會真的和現實一樣，但人物的面型是大都差不多的。例如明清之際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其間出現的人物，忠臣，志士，漢奸等等的作爲，古今人相去一定不會很遠。那末，把他們勾稽一下，給現代人看看也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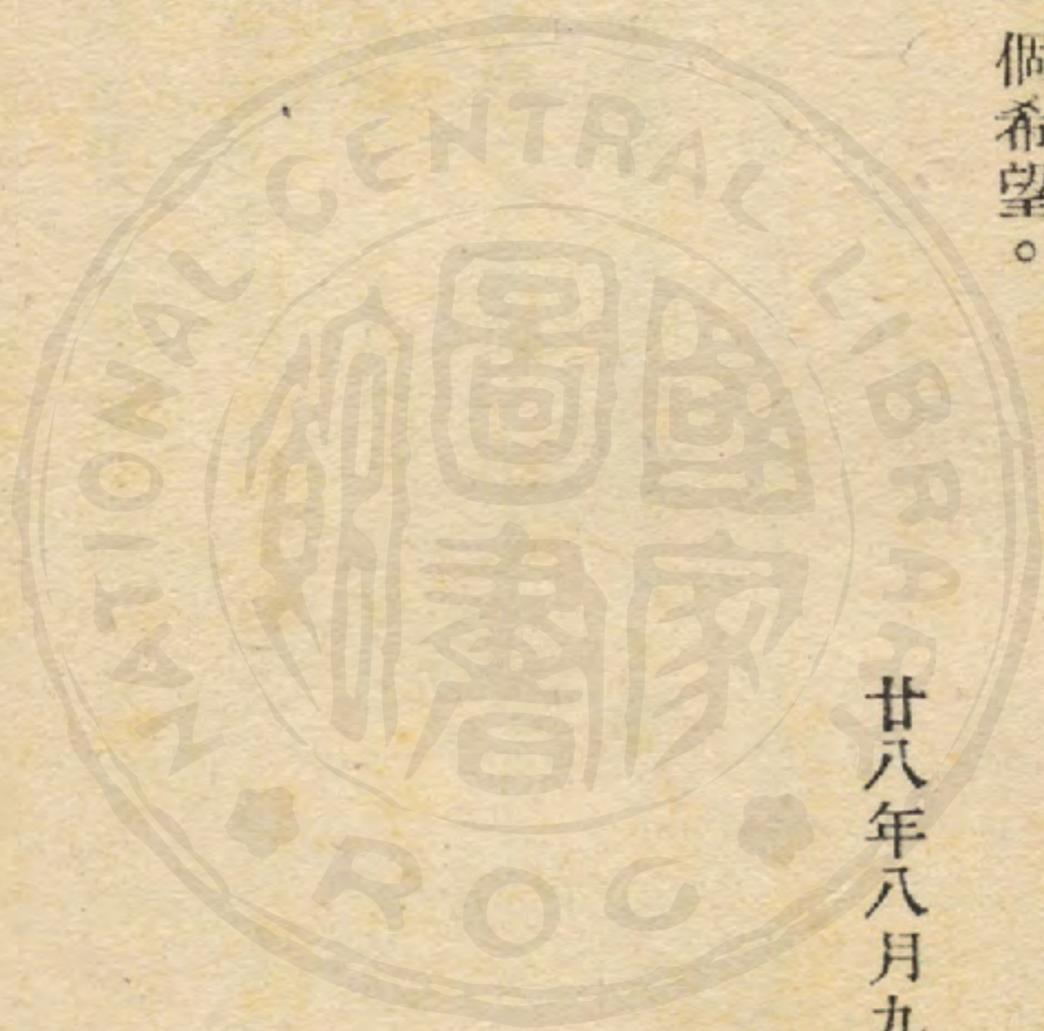
但一點是要鄭重聲明：我並不承認明末的命運卽是現代中國的命運，這兩者相去是太遠了。只要指出一點，明末是亡國的命運，而現代中國却是建國的命運，從任何一方去觀察都是如此，我堅決地相信。

關於本書的題名，我本來擬的是柔日集，取古人讀史的意思，而且還有弦外的含蓄；但畢竟因爲我的文章還夠不到言史，只是說說演義唱唱大鼓的脚色而已，所以只得割愛。無已，只得在六篇題目中攝取『清明』兩個字，

勉強說它的意義，不過是這許多文字中都涉及清明兩個朝代吧了。

但是，在這侵略屠殺的烏煙瘴氣時代中，誰都盼望清明時節的到來吧，我且在這裏寄下一個希望。

廿八年八月九日記。





# 目次

題記	一
明末·南宋·東晉的和戰	一
明末士子的氣節及與政治和妓女的關係	一三
清初鎮壓士氣的三大獄	二九
清初貳臣的生涯	四六
明末浙東的對外抗爭	六八
清初理學與民族革命的關係	八八



## 明末·南宋·東晉的和戰

近人論中國現今的外寇，總是和東晉、南宋、明末三個時代相提並論，這確是很相似，那時的漢族都保不住中原的統治，而立國於偏安之局。從大體上看來，似乎就是歷史在重演一下；但仔細的體察起來，實在是不大相同的。

論那時外寇的勢力，東晉的五胡，南宋的金遼蒙古，明末的滿洲，皆是旗鼓相當，國力都比漢族強盛；但三個被侵略的國家，用來承受侵略勢力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之結果也互異，在這互異的結果，很可以給後來的人們看出一條清晰的大道，因為歷史是不會騙人的東西。

這三個朝代中最沒有辦法的是明末，流寇李自成陷北京，明思宗殉國，

吳三桂引狼入室，想利用幾十年來世仇建州衛的勢力來光復明室，但結果却反遭人家的利用，很輕易的佔有了華北。於是福王卽位於南京，想效東晉和南宋的故技，圖偏安於一時，但却並沒有一定的立國方針，主戰既不能，主和又不敢，只是模模糊糊的度日子。清兵一下江南，無聲無色的就斷送了三百年的漢族統治權。既不能戰，又不能和，這是弱小民族受到侵略時最糟糕的辦法，非活生生的亡國不可。戰固是抵抗外寇唯一的立國條件，和也是苟延殘喘生聚休養以圖復舉的變通辦法，唯有不死不活的不戰不和主義，才是一條最狹仄的死路。明社之屋，便是亡在這一條路上。

不戰不和主義，固然是明室覆亡唯一的條件，但一看明末那些貳臣們如陳名夏龔芝麓之流再番對流寇和異族輸誠投降的醜劇，更可以看到明亡的一個重大因素。從迎降的人之衆和抗戰殉節之士之少，便可知道明朝歷代十兇九惡帝皇摧殘士氣所種下的惡果。帝皇視臣民如倡優隸卒，那是明代所開

始的，臣子對帝皇要跪在地上論政事，大臣可以按在廷前打屁股——廷杖——也是前代所沒有的。再加上一班沒有生殖器的陰險小人和毫無學識的村婦當道，使天下士子競走於其門；拜乾爺，建生祠，幾千年來奉為聖經賢傳裏一點僅有的廉恥，都給銷磨得精光。那時異族入寇，就很容易變成奴才，為新主効力了。

明之亡，直接的原因當然在當時小朝廷的不戰不和主義，但間接的原因還是在於士氣的銷沉。讀清史的看到清兵下江南後，統治漢人如此之容易，和幾個僅有的匡復漢族運動發展如此之艱難（這是指張煌言瞿式耜輩而言，吳三桂等武人的發難是不能算入的），使後來者可以知道激厲士氣是何等重要。激厲士氣，在現代的狀況下，當然是指組織民衆了。

明末小朝廷的覆亡是很快的，從思宗殉國（一六四三）起，第三年（一六四五）便陷南京，捉住福王，至清兵陷舟山羣島，魯王入海，桂王被弑，

明祚便宣告終結。海外邊疆的殘餘勢力，雖要到平定台灣（一六八三）才算消滅，但已算不得什麼了。即便前後算進，亦不過四十年而已。這一和南宋的偏安運命相比，便見得後者要好得多。當金兵陷汴京，徽欽兩宗蒙塵的時候，高宗倉卒即位於南都，無可遣之將，無可用之兵（當然是不能用演義的眼光來估計岳飛的），那時的情形是和明末並沒有什麼兩樣的，而且金人對於宋的外患，歷史較建州衛要悠久得多，宋人夙受威懾，實是不足以言一戰的。那時南宋君臣的見識，比較明末來得高明，他們知道不足言戰，只得言和，於是結之以子女玉帛，事以之伯叔父兄，總算免去了滅亡之慘。後來讀史的，看到南宋君臣對於異族卑躬屈節的稱臣醜態，實是漢族最大的一個恥辱。不過恁他怎樣無恥的曲盡臣節，結果還免不了崖山的慘事，雖比明末是多苟延一百五十餘年，總究只是百步與五十步而已。

南宋的君臣只知道偷安一時，絕不想在苟延殘喘之中，好好的生養休息

以圖再舉，而且變本加厲的對於國內士氣加以摧殘，北宋的士氣比較明末更來得激昂，陳東以一太學生，居然敢上書慷慨言國事，可見北宋的士氣實是培植有素，偏安的朝廷，儘可再加以激厲，使其發展於全國人民，進而爲規復中原的雄圖。武將如宗澤岳飛韓世忠亦是極力主戰，亦正可用以訓練武備。奈何一殺岳飛，使武將解體，韓世忠甚至騎驢湖上，不言國事；再殺陳東歐陽澈，使天下士子緘口不敢言事，而專聽幾個具有奴才根性的臣子去議子女玉帛，稱姪稱子，名義上雖號稱一國，實際上早做了金國的藩籬。這樣一來，主子既做了敵人的臣僕，人民那裏會有什麼敵愾，就此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以至於烟盡火滅。從高宗卽位（一一二六）以至於南宋中葉韓侂胄爲相，這八十年中，南宋的君臣便在卑躬屈節之下營偷安的生活。

但八十年之後，南宋的情形便和明末相同了，他們也走入不死不活的不戰不和主義的狹路，韓侂胄似道那些宰相都是妄人，對於和戰大計根本上

是一些沒有認識的，八十年來的積弱，連國無可用之兵可遣之將都不估計，而輕舉妄動和金國開戰。然而戰又戰得不死不活，忽戰忽和，終於兵敗身辱。南宋君臣連像從前一樣，想做金國的順臣還辦不到，只好讓孤兒寡婦到崖山跳海去結束偏安的歷史。

南宋的前轍，是給主和者唯一的好榜樣。真真的和議，並不是畏葸，而是絕對有其嚴肅性的，在或種情形之下，借和議的時日，而進行生聚休養以圖再舉的準備，並不是一議了和就此拉倒，這樣議和與投降是毫無分別的，南宋在尊金國爲伯爲父的時候，就早已亡國的了。

東晉的局面，却和南宋明末不同，自劉聰陷長安，愍帝蒙塵，司馬睿卽位於南京，始終是以戰立國，不曾和外寇有過什麼議和。東晉的情形當然要比南宋明末好得多，它的敵人並不像宋明只有一個，劉聰石勒之流的勢力是分散的，而且互相交攻，和晉室並不是專一的敵人，而漢族在江南亦還保持

了相當的勢力，陶侃等一些將領也能戮力於皇室。因之東晉始終以戰爲國策，甚至於還幾度渡江北伐；謝尚和殷浩之伐秦，雖然是吃了敗仗，但再接再厲的勇氣却是可取的。這使後來桓溫之北伐，便有了很良好的成績。東晉的君臣，雖在極度困難中，外寇來時，也知道只有抵抗之一法，舍此別無他途；即使積弱到孝武帝時代，赫赫有武功的陶侃和桓溫都已死去多年，剩下的只是一些文弱之臣如謝安等，對於縱橫不可一世的符堅，還敢盡力抵抗，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淝水之戰』的勝利，把長江劃成歷史上南北的鴻溝，使胡人不敢再行南犯，這不但史官如司馬光者值得大書特書，連千載以下的今日讀之，亦覺不勝鼓舞感動。

當時符堅的氣焰是不可一世的，他的意思是非滅亡晉室而淹有江南不可，他說道：『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尅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他的兵力是長安戎卒六

十萬，騎兵二十七萬，連慕容垂的兵二十五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真的是投鞭足以斷流。這種抱必勝之志和必亡人之國的來意，謝安是知道很清楚的，他知道即使去議和，符堅也一定不會採納，與其和而亡，不若戰而亡，於是毅然決然一戰。他的兵力，只有良家子三萬騎，以當符堅百萬久戰之師。然而淝水一戰，將符堅殺得一敗塗地，造成漢族抵禦外侮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這裏很可以看出東晉上下的同仇敵愾，才有這偉大的成功；尤其是『良家子至者三萬騎』，最令人感到全民抗戰的重要，在民族生死存續的關頭，唯一的方法是發動全民的抗戰，其力量之大實是無從估計。

不過漢族雖有過這樣一回大捷，究竟也沒能夠渡江去規復舊土，只把長江分爲鴻溝，互不侵犯，一直到隋唐統一爲止，中國就有了南北兩朝。那時漢族爲什麼不能去渡江圖規復呢？五胡自相兼併殘殺的時候，正是替漢族造絕好的機會，然而漢族却不能乘時規復，這只好歸罪於那時的一些武人，他

們爲了自己的地位和野心，不惜放棄良好的機會。這些武人如淝水之戰前以的桓溫，戰後的劉裕，倘使他們不抱做帝皇爭權奪利的野心，依他們的力量，異族爲他們造成的機會，頗足以規復舊土。然而他們僅爲了個人利益，迴師不顧，坐失良機，直到隋唐爲止，使三百年中漢族永無統一中原之日，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看了明末·南宋·東晉三個國家的命運，便可以有一個結論，就是不戰不和主義的直截亡國，主和而倘使不自振作也只好歸入滅亡之途，而抗戰却是唯一維繫國脈的大道。

這幾年以來的中國，情形和明末·南宋·東晉再像也沒有，我們也有過明末的不戰不和主義，也曾局部的開個幾仗，也曾忍垢負辱的簽過協定；也曾有權威者之流，感嘆着沒有一個南宋的秦檜，也曾有過數十萬『太學生』的上書，也有過幾個騎驢湖上的不得志英雄，我們是歷過明末和南宋各種滋

味的。

中國今日的外寇，決不是明末的建州衛和東晉的五胡可比，連比南宋的金人還要利害，他是中國六十年來的世仇。他們不像古代的外寇，一味恃着蠻力，沒有計劃的侵犯，而是有着系統的計劃，從各方面着手來的。我們倘使採明末的不戰不和主義，當然直截亡國毫無疑義，即使忍辱的採南宋主義，也必爲強敵所不許。於是盧溝橋事變一起，全國卽一致採取東晉的抗戰了。

抗戰以來，全國始終抱着一致的信念，因爲和議是決非強敵之所肯接受的，而和必亡國，不若一戰，這是東晉的謝安一些人所抱的信念相同。與其和而亡，不若戰而亡，因之有淝水之戰的大捷。而我們有這個和東晉君臣一樣的观念作出發點，也決不會被主和主義所動搖，台兒莊的大捷，正是現代東晉的淝水之戰，更堅決更充實這次抗戰的信念，基於歷史上的觀察，抗戰

前途之勝利，是有相當把握的。

從明末和南宋亡國的因素中，可以提供我們殷鑒的，乃是士氣的消沉，使我們知道在抗戰中對於民氣的重要，在現代化的國與國的戰爭，全民動員的重要，決非中古時代可比，開放言路和組織全國民衆，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在淝水之戰勝利的因素裏，也可以提『良家子三萬騎』這件史實來做參考。

現階段中國對於外患的應付，由於明末的狀況進而至東晉的態度，而且更有一次台兒莊的大捷來給現代符堅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決不能像東晉那麼偏安下去算數，必須要更進而爲收復失地的戰爭，因此也必須從每一個鬥士的心目中，除去桓溫劉裕這些人爭地盤和利己的野心。敵人國內大衆的動搖和經濟的崩潰，正是敵人給我們造的良好機會。

漢族對於外寇的抗爭，幾千年以來的歷史已經給我們指出一條坦蕩的大

道，只有歷史不是會騙人的東西。



廿七年四月十日

## 明末士子的氣節及與政治和妓女的關係

明朝一代幾個皇帝，除了宣宗略具些人氣之外，差不多都是十兇九惡的士氣摧殘者。在文學史上，明朝一代的萬曆以前二百年中，幾乎一無足取，一代詩人高青邱，把他作品放在清代康乾年間，恐怕連一席地都不能有；『臺閣體』三楊的著作，在王漁洋袁子才眼中，也真要笑掉了牙齒的。

晚明的政治，嚴嵩弄權於前，繼之者又是爲政尙嚴猛的張居正，這一位明代墨索里尼式人物的功罪，固然不易論定，但他對於士氣的摧殘也是不遺餘力的，幾個初出茅廬的書獃子要想標榜一些氣節，卽是非杖卽貶，把大家的舌都結起來。數十年政治勢力的壓迫，便使那時文風丕變，所謂有『晚明文學』的出現，大致頗與魏晉的文士差不多，不問政治世事，行文尙清峻通

脫，剝去宋儒衣冠，披上了釋家袈裟；做人也是如此，所以藉免罪戾。那時有一個李卓吾（贄），很像魏晉時的嵇康，還不能像袁中郎兄弟那樣脫盡火氣，他『專崇釋氏，卑侮孔孟』，結果便非罪死不可的了。

張居正一死，重石移去，久處壓迫的士子漸漸想翻身了。大爲袁中郎所欽佩的『吳中大賢』顧憲成已在無錫的東林書院種下了氣節的種子，到了這時候才發揚廣大起來，在明末發動三個重大的鬥爭：先和魏忠賢鬥爭，再和魏的門下阮大鉞鬥爭，以至和滿清的鬥爭，迄於烟盡火滅。

其實所謂『晚明文學』的主將們也還是尙氣節的，但他們不熱中於政治，只是消極的以氣節是尙，不附勢，不阿好，已算是很清高的了。袁中郎要辭官，寫了去吳七牘，扭扭捏捏得很可笑，可以見得一斑。萬曆末的士子則不然，他們熱中政治，很想做官替國家辦事，爲了要排除異己，不惜嫉惡如仇。爲結集政治上的勢力起見，乃有類似今日政黨的組織，而且互相標榜

利用，以至於不辨小人君子，都一起拉在裏面，這就是明末幾個『社』的成因。他們轟轟烈烈支配中國政治社會幾十年，到了滿清入關，取消人民結社的自由，才算了結的。

晚明士子氣節最激昂者，在嚴嵩專權時代有一個楊椒山，此後一經嚴嵩張居正兩人的壓迫，便寂寂無聞。一到東林的勢力培養成功，士子氣節的表現，便顯示於魏忠賢專政時，最著名的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二十餘人。他們的罪名，是被誣貪贓，坐追錢數十萬。那時民氣也實在激昂，有人出來爲他們募捐，幾天之內，數十萬立就。但待送到京師已來不及了，他們都先數日被魏忠賢非刑打死在獄中。楊左諸公的氣節，在顧公燮所撰消夏閑記摘鈔中可見一斑：

及左公爲逆闖害，下詔獄，史公（可法）冀求一見，逆闖防伺甚嚴，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公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

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屨，僞爲除不潔者，引至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抱公膝而嗚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卽先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同時和左楊兩公被殺者，尙有周順昌繆昌期等多人，乃激起蘇州的民變，首事者所葬卽所謂『五人墓』，後來復社的領袖張溥有五人墓碑一文，是很膾炙人口的。

那件牽連很多的大獄，卽汪文言之獄，算是明末士子氣節的第一次表演。死事的人，在他們眼中，卽是先烈，先烈的後裔，便很被人所崇敬。清

初大儒黃梨洲，即汪文言之獄中被難的黃尊素的兒子，他在少年時即赴闕鳴冤，親手拿錐子刺逆黨許顯純的股，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壯舉。後來梨洲於南都公討阮大鍼時，便被派作先烈後裔的代表了。

這一派人只好說是一個開端，那時的政治已由承平而趨入動亂，邊事也開了端，士大夫一面慷慨言邊事，一面便激昂清君側。其聯絡點乃由於東林的講學，把正人君子聯繫成一派。他們既一尚氣節，又熱中於政治，便連詩文的風格都變了過來。但他們大都是儒林傳中人物，氣節與品行是同等講究的，而且東林人物至與政治發生關係，完全是偶然的，並不像現在的政黨，有了種種組織才參身於政治。

到了後一代的兒子輩手裏，局面便擴大了，東林的後身復社幾社等社，幾乎便是現代政治上的政黨，勢焰薰天，炙手可熱。研究文學史和政治史的，不可不知道，明末的政治，才是真真讀書士子的文治政治。舉一個例，

宜興周延儒的再度入相，便完全由於東林的後身復社的勢力，延儒一做了首輔，他的政策差不多都是著名的文士張溥在幕後策劃的，而張溥就是組織復社的領袖。

這時候與復社合作的應社領袖吳昌時，是一個神通廣大的政客，他的官不過是吏部郎中，然而他可以幫復社的忙把周延儒捧上相位去，也可以把前任首相薛國觀弄死，真是陰險得很的小人。但是君子們也居然和他延攬結交。一代大詩人吳梅村，更和他折節相交。後來周延儒賜死，吳昌時也同時被殺，梅村做了一首很出名的鴛湖曲悼哀他，因為吳昌時是嘉興人，還有一首鴛湖感舊的七律說：『予曾過吳來之竹亭湖墅，出家樂張飲，後來之以事見法，重游感賦此詩』：

落日晴湖放棹回，

故人曾此共登台；

風流登盡溪山改，

富貴何常簫管哀；

燕去妓堂荒蔓合，

雨侵鈴閣野棠開；

停橈却望烟深處，

記得當年載酒來。

梅村做這首詩和賦鴛湖曲的時候，已是清兵入關後很久的事，猶曰『故人』，可見他們在那時結納之深了。

復社的領袖張浦和張采，身雖未出仕爲顯宦，實在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他們的一代已經和天啓東林人物有了不同，頗有操縱政治的野心，而且時常開會講學，講組織，講聯絡排斥。但他們畢竟是儒林傳中人物，行爲和文章都是合乎理法，不敢放恣浪漫的。

到了北都淪陷，清兵入關，一般青年後輩均聚集於南京，便演出最激昂最浪漫的事蹟。他們於氣節是崇尚的，但脫不了爲氣節而氣節的少年人浮躁氣。於政治他們雖沒有做官的野心，但受了張浦等影響，也要主張以清議干預朝政。於文章則雄奇恣渾，一掃晚明人通脫清峻習氣。他們的文章雖不是

什麼了不得，但也是有閉前啓後的功績，清初文家的作風，和他們都是一脈相通的。

因為是青年，儒林傳中的一股矜持氣象是沒有了，於是行爲就通脫起來。明朝人以爲嫖妓飲酒，是潔身自好的表示，這般少年士子便大大貫徹挾妓飲酒賦詩屬文的作風，南明便成了中國娼妓史上最具有文學氣息的一頁了。

這些少年們最著名的是所謂『明季四公子』，是桐城方密之（以智），如臯冒辟疆（襄），歸德侯朝宗（方域）和陽羨陳定生（貞慧）。這裏面冒侯兩人最知名，陳貞慧即是清初大駢文家陳其年的父親，方密之則比較無聞；侯方域的古文尤爲清初一大家，他的壯悔堂文集是很流傳的。

他們都是少年好事，冒辟疆尤其是家境富有，好爲盛舉，他曾發起過桃葉渡大會，召集當時到南京應試的諸先烈遺孤，左光斗黃尊素諸公的兒子差不多都到齊，算是一時壯舉。那會的盛況，當然又是慨慷激昂，大家講究氣

節，要改良政治那些事。那些少年文士行事，大都是和他們前輩相同，但有一事却是前輩所無，原來南京是著名秦淮佳麗的所在地，而桃葉渡的盛會，正是假地於『河房』遊舫等處的，於是他們不知不覺地和妓女發生關係了。

明末秦淮河的盛況，正與清代的揚州一樣，余澹心的板橋雜記說：『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既稱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曰某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槳擊鼓，踢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鬧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這樣的繁華，怎不令那些血氣未定的少年文士和秦淮妓女發生關係呢？自留都改作首都，景況愈盛，公子王孫，清客幫閑，以世事與妓女作經緯，發生綜錯複雜的關係。

明末秦淮的妓女，是特別有傑出的人呢，還是人以事傳？總之，很夠一

些酸寒文士詠傳於後世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故事，具見雲亭山人（孔尚任）所譜的桃花扇，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與傳說，除了冒氏的影梅庵憶語及傳奇之外，到現在還有伶人在上海胡七八糟的排演，那些都是很膾炙人口的。有還身繫一代興亡的陳圓圓，也是秦淮歌妓，在董小宛之前，先和冒辟疆有了嚙臂之盟，後來被國戚田畹購去送給吳三桂的。（雲南大學教授李奇偉君於去年譜玉庵恨傳奇，即叙陳圓圓事。）錢牧齋（謙益）以東林前輩，也娶了柳如是，龔芝麓（鼎孳）娶了顧橫波（眉生），其他名妓如寇白門鄭妥娘卞玉京之流都和當時的名士如沈士柱沈壽民等也發生了關係。

連天啓朝的東林元老黃道周，據說也在秦淮有過一段關係，說是橫波夫人顧媚，在未嫁龔芝麓之前，曾因朋友的慫恿，趁道周酒醉，白身和他臥了一夜。不過這是證明道周的道學工夫，他竟然能裸裎在抱而不動心，實在不能在這裏和他的後生小輩相提並論了。

關於吳梅村和卞玉京的一段戀愛故事，是很有趣的。梅村的詩我很喜歡，但對於他的爲人總不敢輕易下批評，他是江蘇太倉人，情思纏綿，風格適上，爲復社領袖張溥的弟子，他的中會元，點榜眼，據說也是復社的關係，這只好存一疑說。他也是崇尚氣節的一人，後半期的復社隱隱奉他爲領袖，而且東南各社也都奉他爲祭酒。他的詩爲國初（清朝）四大家之一，現今所傳的滄浪吟謝定本，大都爲入清後所作。我們可以在詩集文集中看到他和卞玉京的關係，玉京爲秦淮名妓，明亡後削髮爲女道士，梅村文集玉京道人傳云：

道人姓卞氏，秦淮人，與鹿樵生（卽梅村別號，曾著有鹿樵紀聞）一見，遂欲以身許，酒酣拊几而顧曰：『亦有意乎？』生固爲若弗解者；長嘆凝睇，後亦竟不復言，尋遇亂別去。久之，聞其復東下，主於海虞一故人，生偶過焉。尙書某公者，張具請爲生必致之，衆客皆停杯

不御，已報曰：『至矣』。有頃，回車入內宅，屢呼之，終不肯出，生悒快自失，殆不能爲情，賦詩四章以告絕。

梅村詩集有琴河感舊詩四律，序云：

楓林霜信，放棹琴河，忽聞秦淮下生賽賽，到自白門，適逢紅葉。

余因客座，偶話舊遊。主人命犢車以迎來，持羽觴而待至。停驂初報，傳語更衣，已託病店，遷延不出。知其顛顛自傷，亦將委身於人矣。予本恨人，傷心往事，江頭燕子，舊壘都非；山下靡蕪，故人安在？久絕鉛華之夢，況當搖落之辰。相遇則唯看楊柳，我亦何堪。爲別已屢見櫻桃，君還未嫁。聽琵琶而不響，隔團扇以猶憐。能無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漫賦四章，以誌其事：

其一

白門楊柳好藏鴉，

誰道扁舟蕩槩斜；

金屋雲深吾谷樹，  
見來學避羞團扇，  
却悔石城吹笛夜，

玉杯春暖尙湖花；  
近處疑嗔響鈿車；  
青驄容易別盧家。

其二

油壁迎來是舊遊，  
緣知薄倖逢應恨，  
故向閑人偷玉筋，  
五陵年少催歸去，

尊前不出背花愁；  
恰便多情喚却羞；  
浪傳好語到銀鈎；  
隔斷紅牆十二樓。

其三

休將消息恨層城，  
車過捲簾勞悵望，  
青衫顚顚卿憐我，

猶有羅敷未嫁情；  
夢來攜袖費逢迎；  
紅粉飄零我憶卿；

記得橫塘秋夜好，

玉釵恩重是前生。

其四

長向東風問畫蘭，

玉人微嘆倚闌干；

乍懶錦瑟描難就，

小疊瓊箋墨未乾；

弱葉嬾舒添午倦，

嫩芽嬌染怯春寒；

書成粉箋憑誰寄，

多恐蕭郎不忍堪。

一和妓女發生了關係，便脫不了舞衫歌扇，明末雖是干戈擾攘，北兵南犯，流寇西竄，不可終日，但江南一帶尙是昇平局面。明末士子都喜歡填曲演戲，如張宗子陶庵夢憶中所記金山寺演夜戲情景，便可見一斑。富有的公子名宦，都家蓄聲伎，排日演唱，清客幫閑之徒鎮日往來品評甲乙。那時爲正人君子所不齒的阮大鍼馬士英，其實都是此中好手，大鍼作燕子箋春燈謎諸傳奇，至今流傳，士英的詩亦擅場，冲淡絕似陶淵明，惜至今不可得。大

鉞曾於天啓間奔走魏闈之門，名隸逆籍，但他的爲人，也並非真能爲惡者，宜興陳貞慧的兒子陳其年冒辟疆壽序有云：『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按：大鉞安徽人，明人類以『皖人』呼之而不名）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爲諸先生所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吳梅村亦記他們的詈詞云：『若璫兒媪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這樣的尙氣節使酒罵座，真不免有爲氣節而氣節之譏，大鉞既不能以詞曲自贖，乃交通楊龍友使秦淮名妓李香君向侯朝宗爲道地，香君却又是一個尙氣節的女子，反說了大鉞的壞話，激起那些貴公子們的怒火，遂有『留都防亂公揭』羣起而討阮大鉞的檄文。大鉞也老羞成怒，蓄意要置他們於死地了。

清兵一下江南，馬阮固然變成漢奸，阮大鉞還鬧了大笑話，但他是無恥

在先的，不必論他。連正人君子黨中的人物，平時以氣節自高的，到這時也很灰色了。如幾社的鉅子松江李舒章（雯）早已投身賣靠爲多爾袞的記室，傳誦一時的攝政王致史可法書便是由他捉刀的。錢謙益投了新朝，吳梅村和侯方域約好大家不屈節，結果一個回到河南去中了一個副榜便去世，梅村隱居了幾年也被拉出來做新朝的祭酒，只剩了『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兩句空言。惟有浙閩廣西一帶的義士，還在那邊支撐漢族士子的氣節數十年。

到了滿清一統宇內，鴻博之網大開，又把士子的氣節壓縮到故書堆裏去。他們沒有氣節可使，不許結社結黨，不許與聞政治，人心方纔漸漸的『糾正』過來，連妓女都不大好明目張膽去玩了。這之後，大概又是二三百年太平盛世之治吧！

## 清初鎮壓士氣的三大獄

滿洲人的入主中原，仗着堅甲利兵和作爲『聖人前驅』的漢奸如洪承疇、吳三桂之流，對於軍事上勝利的把握，是一些不成問題的。從甲申（一六四四）入關，到次年乙酉（一六四五）使西取長安，南陷江甯，淹有了漢族的大半河山。所謂『南明三朝』者，福王（弘光）亡於乙酉，唐王（隆武）亡於丙戌（一六四六），桂王（永曆）亡於庚寅（一六五〇），才六年中原便盡陷於滿人之手。連後來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三藩叛變和鄭氏台灣占據的『救平』（癸亥一六八三），統統算起來，也不過四十年。南明三朝的滅亡和三藩的救平，還是『以夷制漢』的，滿洲人也出些力氣；至『討伐』台灣，就完全用『以漢制漢』的方法了。水師主帥施琅，便是後來傳誦婦孺之口的

『施公案』主角的父親，主持經略的大吏也都是漢人，他們合力把漢族海外的一點火種都潑熄了。

明代之不注重武備，是和宋代相彷彿的。滿洲以北方之強，早就看不起漢人的兵力，多爾袞一進北京，就敢抱起姪兒稱帝，並不是冒險，而是有了決必勝之策的。他攬得了中國的北方和中原，覺得一些不會失算，十餘年來爲患中國的流寇，簡直是爲滿洲的『聖主驅除云爾』。

但一待取了南京，經略江南一帶，棘手的事情便來了。和滿洲人堅甲利兵作對的，並不是明朝的猛將雄師，而是一個個從四書五經堆裏攢出來的士子；明代的士子平日是並不擊劍使馬的，文縐縐的人遇到家國危難之日，竟然都站了起來。閻應元官才一個小小的典史，居然也要把竊敗的江陰城守上八十一天，以閩城素未習武的鄉民，乃敢當滿兵二十四萬，死其衆六萬七千餘人；真令滿洲人看了驚異萬狀，嘆爲奇跡，他們到這時候才真覺得漢族的

力量了。

滿洲人和南明三朝的戰鬥中，最強項最勇敢的敵手，都是讀書人出身的人物；相反的倒是武將，沒有一個不是混蛋。福王的史可法，魯王的張蒼水，唐王的黃道周，桂王的瞿式耜和張同敞，在昇平時代，他們都是擡高第掇巍科的人物，到了家國危急之秋，竟然都成了抗戰的英雄。有了這些先例的存在。滿洲人就不敢不放大眼光來看漢族的士子了。

那時江南士子羣裏，抗戰最厲害的，是松江夏考功（元彝）和陳臥子（子龍），他們並不是個人的發動，而是有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作背景的，那便是幾社。幾社是張溥等復社衰落後最著名的組織，楊鍾羲雪橋詩話云：

雲間幾社，李舒章（按：舒章名雲，失節事清最早。）與陳臥子承

復社而起，要以復王李之學，共七十二人，王玠石爲首，青浦邵景悅（梅芬）繼之，與張處中，徐桓鑒，王勝受業於臥子，時稱『四子』，

……當陳（臥子）夏（考功）壬申文選後，幾社日擴，多至百人。

幾社雖和復社略有不同，初不涉及政治，是純粹以文章爲勝業的文學團體，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操選政』，刻制義，月旦闡墨。但到清兵下江南時，夏考功和陳臥子兩巨頭便聯合吳勝兆起義，同時還有吳應箕，吳易，顧杲，熊魚山，方以智等名士參於其事。結果兵敗被擒，除方熊逃亡削髮爲僧外，餘均以性命文章殉民族國家。其死事之烈，陳夏兩公，實爲江南士子中第一聲，頗使得意忘形的統治者和侵略者躊躇一時了。

滿洲人既然認清楚了漢族士子的面目，就不得不於有絕對把握的軍事以外，分出一層心計來籌劃對付的方法。就是用懷柔的方法呢？還是來用高壓的手腕？滿洲雖是游牧民族，政治手腕也正復不劣，加以漢族無恥官吏如范文程洪承疇的策劃，結果是懷柔與高壓並施，用雙管齊下的方法，逼使漢族士子就範。

第一步的手段，是恢復明代的科舉制度，誘熱中的漢族士子入彀，於是一些沒有氣節的士子便以為又逢太平盛世了。沿着明季的陋習，交通試官，賣買『關節』的故事又盛行一時。這樣無恥的勾當，便授人以柄的給滿洲人以一個一網打盡的好機會。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便發生了丁酉科場大獄的慘事。這真是一件震動全國的大獄，大江南北的士子都惶恐不可終日。按清代考試制度：於各行省設鄉闈以試諸生，惟直隸省的順天鄉闈，除本省諸生外，各行省的貢生監生俱可應試，故丁酉順天鄉闈之獄，不獨直隸一省的士子，尤其是江南的貢監，都覺得不卜命之日夕了。

其實事情也很平常，信天翁撰的丁酉北闈大獄記略一書記得很扼要：是科主試者，為翰林侍讀曹本榮及翰林侍講宋之繩，房官大理寺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監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濟等十四人。李振鄴交通關節，落第者忿恨不平，茗溪貢生張漢，杭州貢生張繡虎至寫匿名揭帖分送告發，以

爲要挾索詐餘地，刑科給事中任克溥據情參奏，遂興大獄。

這樣的一件舞弊事件，在科舉史上實在是平常得很的，要不是滿洲人存心興大獄，藉此鎮壓漢族士子的氣節，不過是遣戍幾個試官或甚至斬決幾個主犯便算。但滿洲人有意借此機會，漢族士子的大劫便來了。大獄記略云：

是獄遷延半載，臯陶曰『殺之三』，堯未卽曰『宥之三』也。上意未測，爰書莫定，人人必死，戶戶無生，供給官旗，浩繁空匱，刺探伺候，力疲精衰。於是在內之病者死者時相聞，亦有託爲詩歌，若烏死哀鳴，以冀動人聽。在寓之奔者躲者日相聞。亦有製詩寫怨，先期縊殉，以明不相負，甚有親子讀書懷古，矯矯口談節俠，見其父無生理，索性無賴，賭錢宿娼……

大獄的終結當然是賣買『關節』的諸試官及士子斬決，妻子分發給滿洲的披甲人爲奴，已中式的舉子均予覆試。那二百多各省的舉子，便是懷懷然

不可旦夕的人，大獄紀略云：

至十二月，朝署半空，囹圄幾滿……該部請先行覆試，時諸新舉人多半歸里，祠部文移嚴厲，該府縣拘繫鎖項，押送起解，如同隸囚，無不震恐兼程。諸舉人僦寓，家家畏同疫鬼，未去者驅出恐後，復至者閉戶不納。流離凍餒，與諸保解雜役，偃息於破寺廢觀，頽垣倒屋之間，爨烟如磷，面灰如死，猶執卷咿哦，恐以曳白膏斧鑕。

讀書士子弄到這個樣子，真所謂『士風士氣，蕩掃無遺』，和『南都攻阮』、『松郡起義』那時候風骨凜然的士子，其氣節真有天壤之別了。統治者做到這一步，已告滿足，二百餘人中，除小數人仍不免外，總算得保全首領了。

這次大獄發生後，言官御史承希風旨，以參奏科場爲能事，這一下很中了統治者的意思，於是江南鄉闈及河南陝西山東諸省，均發生了科場大獄，

自然遭劫的都是士子。

那幾次科場的影響很大，也便是統治者的高壓政策生了效力，杜登春的

社事始末云：

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百輩，社局於此索然，幾幾乎熄矣。

又云：

一年之中，爲檻車謀行李，爲複壁謀衣食者無虛日，苟非同社交遊，安能敦古道，竭深情，如親骨肉也哉！

在清代文網史上，順治丁酉北闈科場大獄，恐怕是滿洲人收拾漢族士子第一次施展手段吧！

滿洲的統治者入關後的十四年，羅織成一件科場的大獄，藉以鎮壓漢族的士氣，但全憑一件事來打盡天下士子，是不夠的。而且科場案中罹禍的，多半是沒有氣節的漢族士子，明遺民中德高望重的大老如顧炎武黃梨洲

輩是不肯入彀的。於是無時無地不在乘機而發中，恰巧文風最盛的蘇州發生了哭廟案，又是讀書士子幹的勾當，於是統治者又不惜小題大做的『懲膺』一下了。

『哭廟』事件，發生於順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從那事件上看來，很可知道清初在江南一帶的橫征暴稅，和當時一些甘爲異族牛馬施虐同胞的漢奸小醜的『德政』。哭廟紀略云：

顯治十七年，新任吳令任維初，山西人也，由貢生爲學諭，遷秩吳門，至署陞堂，開大竹片數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國課不完者，日日候比，負欠數金者責二十，欠三錢以上者亦如之。

這樣苛虐的酷吏，而且還是監守自盜的贓官，於是合邑人民動了公憤。

適滿洲的第一任統治者福臨（順治）駕崩，哀詔到蘇州，例於府堂設幕，『哭臨』三日。蘇民由諸生倪用賓等率領，趁江蘇巡撫朱國治在廟『哭臨』，

向他請願驅逐任維初，不料朱國治正是任維初的窩家，反以『震驚先帝之靈』爲理由，參奏倪用賓等十一人大逆不道。這一參奏，正中了統治的意，而且朱任之流又都是漢人，借漢族自己的爭端來推進鎮壓士氣的政策，真是再好也沒有。於是派滿洲侍郎葉尼及英孛，春沙，海勒布等四人馳來查辦，浸浸乎又成了一件大獄了。

會審的地點在南京，倪用賓等起解時的情況，真夠慘厲，哭廟紀略有云：

初四日起解，任令乘馬從，披甲數騎。十一人各械繫，每人押公差二人，披甲數十騎擁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從道旁睨立，不能通一語，稍近則鞭策亂撾。十一人行稍緩，亦如之。父兄子弟見之，惟黯然飲泣而已。

是案除倪用賓等十一人外，復牽連及當時居鄉有德望的士大夫如顧予咸

（松交），他是一個三吳士子的領袖人物，爲少年文社的創立者，但後來總算未及於難，然已家洗四壁了。

『哭廟』案中最知名的人物，總算金聖嘆（人瑞）了，他其實並未首預其事，也是事發後遭牽連的。解至南京，不問情由，先予兩夾棍，杖三十，聖嘆口呼先帝（順治），滿洲四大人怒曰：『上初卽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詛皇躬耶？』這樣便判決一代才人的死刑。聖嘆在獄與家人書云：『殺頭至痛也，藉沒至慘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後來罵聖嘆的，都以此爲藉口，不知聖嘆之所以臨死還要『幽默』，並不是『其言也善』，而是爲了保全妻孥起見。不料聖嘆遭害後，其妻子仍遣戍寧古塔，也可以見得刑罰之嚴峻了。

『哭廟』案雖不是什麼民族起義的舉動，但在順治康熙之際，民思故國，人心嚮往，對於異族的統治很感得苦痛，一聽到故國的遺民有什麼舉

動，便羣起景從響應。『哭廟』案發生之時，適值明遺臣張煌言（蒼水）鄭成功以水師陷鎮江，江南各處，均有人起義響應，這就是所謂『金壇通海案』，都是一些士子們幹的偉舉，統治者把他們恨之刺骨。『哭廟』案是與『金壇通海』案和『鎮江失機』案三罪同時俱發的，區區訴願逐令小事，遂成爲與謀叛大逆同罪，統治者的有意羅織，藉以鎮壓漢族士氣，其用心真是昭然若揭的。

順治康熙之際，對於漢人的壓力施得最厲害，所以許多慘酷的大獄都在這時發生，這原因很多，第一是人民痛定思痛，心嚮故國，再則入關時那些附龍攀鳳的漢臣都已狗烹弓藏，代之而起執政的，都是一些伎刻的滿洲人，如鰲拜等四大臣，手腕之毒辣，真令人驚惕；所以高壓的政策在那時便次第實施了。

他們最大的兩件事是：於順治十七年下令嚴禁士子結社集會，這明顯地

是針對着江南士子而發的，還有一件是江南的『奏銷案』，凡是士子納糧未清的，一概革去功名嚴比，不問官職大小，不問欠糧多少，照例辦理。明季江南士大夫家，抗糧不完納的很多，到清初還沿着舊習，所以這次奏銷案出來，受禍的不知其數，真是所謂斯文掃地了。崑山葉方霽（諡文敏），順治中探花及第，奏銷案出，他只結欠二三錢國賦，還是把功名革掉，當時曾有『探花不值半文錢』之謠，也可和見得高壓手段的厲害和士子被壓迫的一副可憐情況了。

北闈和哭廟兩大獄，雖然殺害了許多人，但那些被殺的士子，畢竟不是統治者視爲眼中釘的人物，顧炎武黃梨洲諸大老，還是往來東南，講學著書，爲漢族散播光復的火種。恰巧和哭廟案同一年，江南湖州發生了『莊氏僞史案』，這個題目更大，罪狀是較北闈哭廟兩獄大得多了，因爲這案是有關於種族之見的，而且牽涉的士子之多，也非前兩獄所可比擬。科場大獄之

外，以文字興大獄者，在清初以此案爲最慘酷，但事實上也都是枉屈得很。

榴龕隨筆云：

烏程朱文肅公（國楨），致政家居，留心史事，所著有大事記。其已付剞劂者，謂之史概，未刻者尙多也，秘藏之家。後因寇盜，有莊氏賃朱氏之居，其子子相（廷鑾）偶見此書，竊爲己有，招集知名之士，妄以己意增損其間，而朱氏原本遂泯沒矣。子相既死，乃父君維（胤城），於鎮北圓通庵召匠刻之，凡五年而告成，號曰『明書』。不知利害，冒昧從事，且自以爲不世之業，誇張其事。一時趨附，廁名於其間，豈知遂召大禍也。

莊氏的『明書』究竟怎樣的『悖逆』呢，據莊氏史案所載：『或問致罪之由，余不知其細，但聞之前人曰，如書中所云王某孫壻，卽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卽清之太祖也，而直書名。又云「長山劍而銳士飲恨於沙燐，

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又指孔耿爲叛。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清年號，而於隆武永曆之卽位正朔，必大書特書，其取禍之端有如此。』其實莊氏的著史，也並無十分對滿清不滿，幾次三番他還想將該書『進呈御覽』。其禍作雖由於嫌者的告發，但要不是莊氏之史書『厠名其間』者這樣多，統治者也決無興大獄之意思的。

所謂『厠名其間』者，有的是由於莊氏的禮聘，有的簡直未曾預聞其事，一半爲了好名，一半爲了貪利，以致『厠名其間』受了大辜。這其間受禍最慘而最爲後世所嘆惜者，爲潘力田（檀章）與吳愧庵（炎）兩人。南社巨子陳去病先生吳節士傳云：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瀾溪人也，諱炎，字赤溟，又字晦如，號晦庵，以遭逢鼎革，繫心故國，不忍背棄，故更號赤民。少承家學，爲歸安諸生，有聲於時。未幾國變，乃遜跡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則與

其伯叔昆季爲『逃之盟』於溪上，一時吳越間高蹈能文之士，聞聲相應而來者數十百人。

潘檉章爲潘耒之兄（按：耒字稼堂，後應『鴻博科』獲售），也知名於時，與吳炎同被殺於杭州之弼教場，同死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餘人。東南負物望的士子，在這時差不多一網打盡了。

這一案所牽涉的江南士子，據秋室集記莊廷鑑史案本末所記，當時知名之士，有茅之銘，吳之銘，吳之鎔，唐元樓，蔣徵麟，全祐，董二酉，陸圻，查繼佐，范驥等十八人。陸圻，浙之錢唐人，字麗京，名尤高，吾鄉全祖望（謝山）鮚琦亭文集陸麗京先生事略云：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唐人也，……與查繼佐范驥二人，於史固無預，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保首領，宗族俱全，

奈何不以餘學生道耶？」遂於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跡蹤。

陸麗京爲東南巨室，他們對於那時的慘狀，實在看得膽喪了，覺得非逃之空門不可，總算還是幸運的。當時最徼倖的要算顧炎武，他與莊氏也有相當的往還，幸而因故脫離，否則，兩廡的冷豬肉，也要吃不成了。

自從莊氏史獄之後，統治者對付士子的方針已確立，一方面極力用高壓政策，累興文字大獄，一方面進行牢籠手腕，於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開『博學鴻詞』科，詔各省督撫大臣薦舉名士宿儒入京應試，朱竹垞毛西河陳其年之流均高擢巍科，文風於是一變，轉而爲考據金石之學，吟風弄月。什麼氣節，什麼故國，都丟在腦後，滿洲人於是征服了漢族的士子，這才太平平做中國的主子了。

廿八年三月十七日

## 清初貳臣的生涯

屈節事仇的人物，我們稱他們爲『漢奸』或『傀儡』，自有史以來，中華民族遭異族蹂躪時，總有這些無恥醜類的出現，真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的。自然，『漢奸』與『傀儡』之間，雖同爲無恥的醜類，但也有輕重彼此的；於是有一個醜脚色出來搽上大花臉唱喏辯解：說他僅是『傀儡』，並不承認爲『漢奸』云。

他的辯解無非是想洗刷出賣民族國家的惡名，所以只承認了是一個無知靈魂的脚色。爲了要揭穿那些巧飾的辯解，便有一位先生出來『正名』，主張廢除『傀儡』一詞。自然，這主張是不錯的，但我以爲爲懲治出賣民族國家的罪人起見，『傀儡』與『漢奸』固不妨同科，但在歷史上則仍舊不妨讓

『傀儡』一詞的存在。因為把『傀儡』視作『漢奸』，實在太把他們當作一個人物看待。例如在今日，真真的『漢奸』，似乎還只有發見一位，而『傀儡』的脚色，却南北滔滔皆是。對於那些沒有主張沒有本領失去靈魂的醜類，似乎不一定都以『現代秦檜』目之的。

傀儡是漢奸的退化，然而却是侵略者的進化，因為侵略者知道用傀儡，就不全恃武力，其中便有些政治作用了。中華民族受異族侵略時，在歷史上出現的醜類，都是漢奸居多，著名的傀儡只有宋代的劉豫和張邦昌，這就是那時金的文化較高的緣故，蒙古滿洲兩族歷史文化都較差，故不知道利用傀儡的政治手腕。滿清入關時，多爾袞於攻取北京後，竟想不到立一個朱明的後裔來號召天下，以致他接到史可法的覆書時，無言可答；這在現代人眼光看來是何等愚笨的事。否則，和南明三朝台灣鄭氏三十餘年的戰爭，就不必費這許多力量和時間了。

明季的士氣，可以分作極端兩派，一派承明朝十凶九惡帝皇的廷杖等等專制酷刑的摧殘，再加天啓朝奔走魏忠賢客氏之門的結果，在殿廷中光着屁股挨打，在太監婦人面前屈膝，早已司空見慣，更無名節兩字可言，一派因東林復社的風氣，以氣節自高，兩派行事不同，遂相水火。一碰到非常事變，疾風見勁草，閹黨的一系，大都是投降；東林復社的一系，大都是殉節或是奔走抗爭。但東林復社的結社中，也有托附聲氣的，在這時却見了分曉，都顯露原形了。

降清的貳臣，大概可分作四種，是用時期來分類的：第一期朱明的正統還存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皮島之降，洪承疇松山之俘，以及吳三桂之薙髮易服。第二期是破了北京的迎降諸臣。第三期是破了南京迎降的諸臣。第四期是滿洲人握住了統治權因漢臣所薦舉而起用的朱明舊人。

這四期的人物，出處既異，後世論其罪狀自然不同，因之貳臣傳也分甲

乙。第一期的降臣，在漢人眼中，他們是大漢奸，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最鉅的，但在滿人的眼中，他們却是大勳臣，因為沒有他們的武力和策劃，僅僅靠一個游牧民族的部隊要唾手而取中原是沒有那麼容易的。然而滿清對付他們也是最煞費苦心。對於文臣如洪承疇，那倒還容易的，只要用爵祿去報酬他好了；但對於武臣，他們不但有大功，而且手下有大兵，微以分茅裂土之義，滿清對於那幾位尾大不掉的漢族武臣實在是窮於應付的。

南明諸朝之平定，吳孔尙耿四人都是功臣，清廷沒有辦法，只得就其兵之所在，分茅裂土，命爲藩王。吳三桂開藩雲南，是爲平西王，孔有德鎮廣西，是爲定南王，耿尙分守閩粵，各自佔據一塊絕大的土地。他們各自組織政府，不獨天下各直省的錢糧由其征調，而且全國的人才也聽他們羅致，平西王吳三桂尤注意人才；故當時『西官半天下』，都是到雲南去候選等候機會的。滿清的勢力只保持荆襄之北，用盡懷柔市恩的方法使他們不生異志；

一方面，自然也在想盡方法把他們剪除。置藩不到二十年，便有撤藩之議起，這便是清廷處心積慮的結果。

清廷對於四藩的用盡心計市恩懷柔，於定南王孔有德的事尤可知道。有德與耿仲明尙之信同爲明將毛文龍部將，鎮守牽制遼東最險要的皮島，經略袁崇煥聽信董其昌的間言，無辜致文龍於法，部下渙散，有德等遂以其衆降建州衛，爲滿清『從龍』武將歸降最早者。入關後有德經略廣西，被李定國所攻，城陷自經死，合家一百二十餘人同殉，只有一女名四貞單騎脫走。這樣『壯烈』的事蹟，真使清廷震動一時了。欲市恩於其他三藩，這正是最好的機會。而且有德雖死，他的部隊都還存在，那些軍隊都是爲清廷所不能駕馭的。於是在京師爲有德建專祠，謚武壯王，以其兒子均殉難，就以四貞食親王俸，視同『和碩格格』（意卽和碩親王的郡主），且爲太后養女，居宮中，護衛儀從俱仍舊。那時四貞的年齡還不過十六，正和福臨（順治帝）的

年齡相當，清廷爲進一步的牢籠計，曾有想策立四貞爲皇妃的計劃，這是清初的隱事之一，爲官書及私人之所不敢記載的，據去年在北平逝世的孟心史（森）先生的考證，認吳梅村（偉業）的做唐人本事詩四首，卽係指順治欲納四貞事，詩云：

其一

聘就蛾眉未入宮，  
待年長罷主恩空；  
旌旗月落松楸冷，  
身在昭陵宿衛中。

其二

錦袍珠絡翠兜鍪，  
軍府居然王子侯；  
自寫赫蹏金字表，  
起居長信閣門頭。

其三

藤梧秋盡瘴雲黃，  
銅鼓天邊歸旆長；

遠愧木蘭身手健，

替耶征戰在他鄉。

其四

新來夫婿奏兼官，

下直更衣禮數寬；

昨日校旗初下令，

笑君不敢舉頭看。

長洲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於此四首後注云：『案：集覽謂詩爲定南王女四貞作。四貞適孫延齡，康熙三年四月，上疏爲父請卹，見八旗通志。細案詩意，第二首以下或詠此事，第一首疑別有所指。』翌鳳去梅村不遠，未必不知順治欲納四貞故事，第以事既未成，官書爲諱，翌鳳雖明知而故爲隱，也是文網森嚴下意中的事。

清廷對於孔有德的後人百般牢籠，無非想把他的舊部移爲己用，以牽制耿繼茂的勢力，使藩與藩之間互相猜疑，漸漸的把他們的勢力削弱，而清廷又不自居於主動的地位。然而結果孔軍還是不能爲清廷所用，觀乎梅村詩第

四首四貞的驕縱，遂使孔門的家將兼女壻的孫延齡不得不叛，代領孔軍的主將綠國安也附吳三桂而反。但清廷牢籠的計策畢竟也有一部份得售的，由於清廷的搆逆離間，引起孔軍的內鬩，四藩的軍隊第一個消滅的便是孔軍。

定南王既撤藩，其他三藩都已舉起了叛旗，經過三十年的休養，清廷的勢力雄厚，耿尙兩藩本無大魄力，滿洲兵扼守荆襄便等於扼住西南咽喉，吳三桂病死，三藩隨之而烟盡火滅了。

在第一期的降臣中，洪承疇是被視爲入關問鼎之肱股的，清初一切文物制度的設施，江南的經略，靡不出於承疇之手，他本想做朱明的忠臣，結果却做了出賣民族國家最出力的漢奸，這是後人很爲之嘆惜的。他之所以死心蹋地爲滿人作奴才，稗史上有種種傳說在，說是清太宗的皇后曾與他有曖昧的關係，使承疇不得不効犬馬之勞以報知遇之恩云云，這些且不去管他。總之，以承疇之『勞苦功高』，畢竟也逃不出『功高主忌』的悲劇。到了晚

年，清廷雖然酬他以高官厚祿，然而還不敢信任他，使他投閑散處，不予以政權，這在承疇的傳中雖然不易看出形跡，但在他的軼事中，是可以看出一點消息的。清人某筆記有其晚年軼事略云：承疇回京後，政事不出其門，同鄉（洪爲福建晉江人）往謁，亦多峻拒；晉江在京固有會館，已窳敗不修，同鄉十數人居之，共相嗟嘆。忽報洪中堂（時任大學士）來回拜，衆大驚，急整衣冠出門迎之，則中堂已至，相揖至堂。衆見堂上忽金碧輝煌，水陸雜陳，供應使呼，亦非舊時人役，皆大怪異。忽中堂肅衆入席矣，忽伶官高唱入雲矣，倏忽間莫明其所來，不知其所去。忽中堂作別回邸矣，衆急送之出大門，拱揖而別。及重回館中，則破屋敗舍依舊，精陳華設已幻，衆人如在夢中云。

觀此一事，則洪以用兵臨陣變化莫測之奇才，用於無聊的遊戲，那時身雖居高位，實無所施展其長才，借嬉戲以自遣其才，也很可以見到爲異族牛

馬似的漢奸末路的悲哀了。而且洪承疇還是善於自處，不至身陷刑辟；否則，連功臣都沒有結果的居多，何況又爲主子所不屑的降臣奴才呢！

滿人對於第二期的降臣，即破北京時迎降諸臣，最合他們的意，所以清初用事的諸臣，大都是這一批人物，因爲這一期降臣是最無恥最合於做奴才的脚色，滿人覺得用他們來做事，是一些用不着担心提防的。他們大都是閹黨的餘孽，間亦有東林復社的敗類。李自成打進了北京，一個個從家裏拖出來，先打了幾百板，勒榨若干兩金銀，給他們一個官，就在草莽的朝廷中覲首稱臣了。這些醜類中，如陳名夏，金之俊，馮銓，龔鼎孳，孫承澤，後來都又投誠了滿清，做了大官；而且清初漢人執政中握權的，便是馮銓和陳名夏。馮益都人，算是代表明季閹黨的一系漢人。名夏，江南溧陽人，代表東林復社一流的漢人。他們樹立門戶，互相排擠鬥爭，各自引薦私人，植黨固勢，一面各自鑽營滿洲執政的主子，以爲靠山。名夏復引薦陳之遴入相，在

多爾袞攝政時代，兩陳一直佔着很大的勢力。

清初所以厚用漢人的原因，固在於滿人爲游牧民族，長於騎射，政治的人才實在缺乏，就不得不用那些醜類來執行政務，取其易於駕馭。實則入關時滿人以武功自喜，初不願其族習於文治，以養成痿靡風氣，所謂『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滿人方引以爲戒，有了這樣的念頭，陳名夏和陳之遴才得在清初活躍一時。

陳名夏爲明末狀元，明亡先投降李闖，復迎清兵於大名，確是一個標準奴才坯子，故多爾袞異常重用。名夏很努力的替主子服役多年，然而結局却是最悲慘的，爲了『留髮復衣冠』一句話，處了絞刑，連兒子都遣戍。陳之遴浙江海甯人，明末探花及第，由名夏引薦入相，他和吳梅村爲兒女姻親，結果也和名夏同樣的悲慘，是全家遣戍遼東。梅村詩集有贈遼左故人六首，卽指其事，詞意悱惻，很可看到奴才末路的景況，茲錄三首：

其二

短轅一哭暮雲低，  
青史幾年朝玉馬，  
燕支塞遠春難到，  
百口總行君莫難，

雪窖冰天路慘悽；

白頭何日放金鷄？

木葉山高鳥亂啼；

免教少婦憶遼西。

其三

潦倒南冠顧影慚，  
君恩未許跨前席，  
雁去雁來空塞北，  
可憐庾信多才思，

殘生得失懺瞿曇；

世路誰能脫左騶；

花開花落自江南；

關隴鄉心已不堪。

其六

齊女門前萬里臺，

傷心砧杵北風哀；

一官誤汝高門累；

半子憐渠快婿才；

失母況經關塞別，

從夫只好夢魂來；

摩挲老眼千行淚，

望斷寒雲凍不開。

又之遴盛時，曾於蘇州婁門營拙政園，極花木之勝，吳梅村亦曾有詠拙政園山茶花七言長句，所云『十年不歸，再經譴責遼海，此花從未寓目』，真也見得那些貳臣們的可憐了。

名夏和之遴兩陳，是代表進取的貳臣一派，及一以微罪伏誅，一以全家遣戍，才看出主子的面目，遂使他們趨向消極一路，如孫北海（承澤）本來也是陳名夏一派中的要角，到這時也寄情書畫，休致回去優游鄉里了。有的便縱情聲色，以風流自居，不敢再以政治顯所長，這一些人中，龔鼎孳可舉為代表人物。

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其人蓋與錢牧齋為同等人物，有文

而無行，李自成陷北京，鼎孳卽從賊，受僞職，多爾袞入京，鼎孳亦首先迎降，可謂是一標準的奴才。但鼎孳實富於才思，風流自喜，以千金爲秦淮名妓顧媚（橫波）脫籍，兩人極相得。甲申之變，鼎孳揚言要殉難，橫波不許他死，故鼎孳每對人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其無恥實是透了頂的。

鼎孳降清後，先前的行爲也和陳名夏一般的進取，常常碰一鼻子灰，有一次鼎孳的論事涉及漢滿的關係，在奴才以爲主子應無分輕重，一視同仁，不料竟不中主子的意，把他降十級調用，爲上林苑蕃育署署丞，遠貶廣東，備嘗苦辛。一待再行起用的時候，鼎孳已明白貳臣的滋味，索性容容尸位，不再有所表見，一面與顧橫波詩酒唱和放誕風流，一面加意扶翼風教提攜人才，故康熙中的文士名流，大半出其門下。他死後天下士子震悼，朱竹垞輓詩，有『寄聲逢掖賤，休作帝京游』之句，可見其享名之隆了。

在這一期貳臣中，龔鼎孳和金之俊都是比較有善果的，鼎孳死後，且得『端毅』兩字的易名盛典，這在當時貳臣中很難得，大概是清廷看他識竅的緣故吧！

乙酉清兵破南京時的迎降諸臣，其行跡和北京迎降的諸臣一樣可醜，只是少了降賊一事而已，但滿人對於他們特別憎恨，在清初那批貳臣始終沒有被重用過。大凡侵略者對於不屈不撓孤忠抗節的人物，總是分庭抗禮的非常看得起他們，而對於蹣跚誤國的佞人，便覺得毫無價值。滿人佔了北方，本無直下江南的企圖，若不是南明諸臣的作爲乖戾，像晉宋的南渡社稷是可以無恙的。弘光南京之亡，簡直是自亡，與滿人不相干的了。

例如福王的大學士王鐸，後來也變了貳臣，就是一個最欺罔的小人，明通鑑附篇卷一云：『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當月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旨云』。阮大鍼更是無恥，當北兵渡江之日，他還

以烏絲闌寫已所作（或云爲其女麗珍所作，見譚正壁所編中國女性文學史）  
燕子箋傳奇，宮中演劇無虛日，後來福王被清兵主帥豫王所俘，就切責他  
道：『汝既僭立，惟縱酒色，聽奸臣納賄報復，不遣一兵討賊，何居？我兵  
尚在揚州，汝何故便走？』這樣一個不能爲是非的昏主，都是他手下臣子把  
他殺害的；然而那些無恥的佞臣却又都做了異朝的新貴。連馬士英也終於投  
降，但新貴還沒有做成，就被清帥剝皮搯草，像犬羊一般的死了。

降清貳臣中，惟有阮大鍼的漢奸做得最澈底，我們讀他歸降後的事蹟，  
真覺數百年尚有餘臭。大鍼在南京未陷時的事蹟，各書記載均詳，唯於他做  
道地漢奸時的事蹟，類多未道及，謝剛主（國楨）先生撰明清之際黨社運動  
考曾引藏山閣文存卷六皖髯事實與世傳吳梅村所著鹿樵記聞的馬阮始末都有  
此項記載，兩本雖有小異。疑出一人手筆，茲據鹿樵記聞全錄之，以見明末  
漢奸醜行之一斑：

貝勒始召大鉞，出薦者手書與之，令以部院從征。隨導王師屠金華以報前怨；明守臣朱大典闔門自焚。時兵荒之後，王師所過，隨征官往往無從取食，獨大鉞必羅列鮮肥，邀諸公暢其口腹。諸公訝之，曰：『此日用應酬耳，吾用兵不可測度，亦類此。』諸公故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自能度曲否？卽起執板，頓足而唱。諸公多北人，不省吳音，則改唱弋陽腔。諸公於是點頭稱善曰：『阮君真才子。』有黑內院者，頗好文墨，學爲詩，才得押韻，便爲擊節賞嘆。內院於是日爲唱和，曰『阮君吾詩友』。每夜坐諸公帳中劇談，至聽者倦睡，聞鼻聲始出。詰朝，天未明，又入坐，聒而與之語，諸公苦其擾，勸之曰：『君精神誠異人，然鞍馬之餘，盍少休息？』則曰：『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來如一日。』比諸公起，則又鼎烹雜陳，人人厭飲。一日面忽腫，諸公謂阮所親曰：『阮君恐有病，可相語令暫住衢州，俟吾輩入閩，遣

人相逐。』所親以告，大鍼駭曰：『我何病？我年雖六十，能挽強弓騎劣馬，我何病？我視八閩在掌握中。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東林復社諸奸徒有譖我者，願諸公勿聽。』所親以復諸公，諸公曰：『此老亦太多心，既如此，仍請同進。』抵仙霞，諸公皆按轡上嶺，大鍼欲實其無病，下馬步進，諸公以嶺路長且騎，俟到險乃下。大鍼左牽馬，右指騎行者曰：『看我精力十倍此少年。』言訖，鼓勇而先。久之，諸公方至五通嶺，見大鍼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馬上以鞭挑其辮，亦不動；下馬視之，死矣。

梅村爲東林復社一派，對於大鍼是相水火的，但這裏的描寫，大概還不至致誣鱗他，聊聊數百字，把漢奸的醜態，真是羅列刻劃無遺。文中所謂『諸公』者，完全是滿人，即大鍼的同事。我們看到大鍼的以飲食歌唱談話的獻媚，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把性命也在這一着上送掉，真可爲之嘆息和憤慨。

試以三百年前的故事例今日，像大鍼那樣懂得諂媚的醜類一定也很多，但可惜都沒有像大鍼那麼的多才多藝，這也是古今人之不相及吧！

第三期的首倡迎降諸明臣中，右班爲忻城伯趙之龍，左班卽身負當時士子重望的錢謙益，謙益字牧齋，少卽有文名，但他的行爲和龔芝麓相似，娶秦淮名妓柳如是爲妾，也和芝麓行徑相同，故在東林黨中號爲『東林浪子』。乙酉的迎降，他以禮部尙書的身份，滿想滿人會震於他的大名而重用他的，不料滿人偏看他不起，只給他一個比原官還小的侍郎，這已使他怨對不堪了。他又自負才學，以修明史自任，不料滿人又偏不給他。做了半年新貴，覺得乏味就回到常熟故鄉去了。

當時南中雖易新主，士氣依然激昂，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均將次第演出，故牧齋以負天下士子重望之身，頓變故衷，自不免爲衆矢之的，最膾炙人口的有虎邱石上的題詩：

入洛紛紜興太濃，

尊鱸此日又相逢；

黑頭已是羞江總，

青史何曾用蔡邕；

昔去幸寬沉白馬，

今歸應悔賣盧龍；

最憐攀折章台柳，

撩亂春風問阿儂。

當時士人吟詩著書刺他的，多得不可勝數，關於其妾柳如是的尤多，潘稼堂甚至當衆罵他爲『兩朝領袖』，這種難堪的貳臣滋味，真使牧齋不好受了，總於鬱鬱下世，死後清廷連把他文人唯一的身后事業都列爲禁書，牧齋也可算是名利俱失的貳臣中一個了。

至於清廷握住了統治之後，因漢臣的薦舉亡明遺臣而被迫出仕的，那種陷身貳臣傳中的人最爲可悲，他們在國變時欲死不能，到後來就求隱不得了。詩人吳梅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這一批的貳臣，大都不是政治的人才，而只是以文章道德知名於世的，

太倉顧湄（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

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本朝世祖章皇帝（順治）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辨，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銳銷槩，輒被病弗能眠事。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

梅村只做了一年的官，已留下千古難濯的污名了，他的行爲根本不可與錢牧齋龔芝麓之流同日而語，我們除了惋惜嗟嘆之外，真也不忍再加以誅伐了。他被徵就職後的痛苦，於他的詩中很可以知道，如言懷云：『只爲魯連甯蹈海，誰云介子不焚山』，投贈督府馬公云：『慚愧薦賢蕭相國，邵平只合守瓜丘』，自嘆云：『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過淮陰有感云：『浮生所欠只一死……我本淮王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以至於懷

古兼弔侯朝宗的『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都是敘述他屈節事新朝內心的痛苦；連臨死的遺命，都念念不忘這個傾西江之水難濯的污名，說『吾性愛山水，葬吾於靈巖鄧尉間，碣曰一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澤洲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見到列名武臣傳中的人物是怎樣的難堪了。

廿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明末浙東的對外抗爭

一條錢塘江把浙江分成東西，有了浙東和浙西兩個地理上的名詞。但平常稱浙東者，其實只是指紹興和寧波兩個舊府屬的十五縣。在浙江省的地理上，這兩地恰在東邊，靠傍了東海，於是也有叫作海東的。

因為地處海濱，民風就比較淳樸粗獷，很少懂得卑污無恥的勾當；所以在民族歷史上，浙東是非常光榮的。從春秋戰國的勾踐以至南宋和明末，浙東總是不屈不撓的建立對異族抗爭的光榮歷史。明末有一位紹興師爺王思任（諱庵），雖然他的善謔是出名的，但一到鄉國危急之秋，他便大聲疾呼『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污之地』（與馬士英書）。清兵南下，他是先以性命殉鄉邦國家了。

滿州人對於浙江最感覺難以統治，屢次在帝皇的上諭里說到浙江的士風最壞。呂晚村，查嗣庭，汪景祺等的文字獄屢起，滿人對於浙江士子更是恨得牙癢癢地，統治手腕最辣的雍正，竟至有一次停止浙江的鄉試，以資懲膺。這在後人看來，却是浙江的唯一榮典，是由許多光榮事蹟所造成的。

經過兩三世紀的時間，過去的史蹟都模糊了，例如有一位雅士跑到寧波，看到滿市商業化的銅臭氣象，便覺得俗不可耐，以爲連甬江的山水也有些沒有鍾靈秀氣了。這也是實情，紹興出名的是游幕師爺，寧波則是著名的錢店掌櫃。雖然在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中，由錢店掌櫃化身的銀行家們並不被社會所看輕，但浙東文風的突然衰落也有歷史的背景，異族的壓迫便是一個轉變的關鍵。浙江人士放棄儒術和仕祿，退而務農和經商，便是對異族入主中原的消極抗議。

當明清之際，浙東的文風原是最盛的時候，過此便寂寂無聞，在滿洲人

統治中國三百年中，浙東的寧波一府，僅出了兩個狀元——順治初的史大成（立庵）和咸豐中的章鋈（采南）。史大成的中狀元，還不外乎是滿洲人對浙東的懷柔政策，他雖然後來仕至禮部侍郎而且以孝子著名於時，但浙東父老對他還不能原諒。在我的幼時，時常聽到老年人談起，對大成的中狀元非常不滿，稱之謂『臭狀元』。當時談論他的人在我們看來，當然也是拖了辮子自稱遺老的人了，但數百年來的口碑相傳如此，也可以見得滿洲人入主中原後浙東人對他們反抗的一般情形了。

至於浙東寧波府屬人士出仕於滿洲的，較明朝就少得多，據我所知，竟沒有一個做到大學士的，內官至尚書的，只有康熙中一個屠烈忠——明小品文名家屠隆（赤水）的裔孫，官至兵部尚書，外官至封疆大吏的就一個都沒有。

雖然沒有什麼文獻可以證明，據我推想起來，在清初的許多浙東人士身

受異族壓迫之痛苦者，一定有共同的家訓，命子孫不許應試出仕而以躬耕經商作消極抵抗的。到了後來，成了風氣，大家所看到的浙東，便成了銅臭世界了。

我們且看明清之際，正是浙東學術文風最昌盛發達的時代。在理學的流派中，浙東學派乃是最拔萃的，開始於明正德時的餘姚王守仁，主張致知格物，稱一代大師，至明末的劉宗周，提倡實踐之學，開光大姚江之學浙派學風的先聲，與後來北方顏元李球的學風遙遙相對。宗周的弟子黃宗羲出，蔚為一代大師，他的學侶和弟子，身歷家國之變，都是和民族革命有關係的人物，便使浙東學派，不僅為虛談性命學理的腐儒，而是富有民族氣息的學術源流了。

浙東學派的和民族革命發生關係，不得不先從劉宗周說起。黃宗羲撰明儒學案中的東林學案，起自顧憲成高攀龍，而以劉宗周為殿，宗周字啓東，

號念臺，學者稱『蕺山先生』，浙東紹興人，仕明爲左都御史。他的講學，以陽明爲宗，極力匡正姚江末流，使其復歸於正，蔚爲一時人望。黃宗羲之學，全從蕺山得來，更從而發揚之，遂爲浙派的中心份子。我在這里不想絮述浙學的理論體系，只把他們和民族革命有關的一提，當然也得先從劉宗周說起。

滿洲兵下江南日，宗周年已七十餘，他以明左都御史家居，滿人耳其名請其歸降，他幾度自殺不遂，乃答書曰：『大明孤臣某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譏名教，取玷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教于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斧鉞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

浙學一代大師使這樣的絕食殉了國家，他因爲年事高了，不克再身與抗

爭，故絕命詞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奉高，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他的氣節和學術，都影響他的許多弟子，使北宋以來羣詬爲空談性理的理學，一變爲反抗異族的躬踐實行者，這是一個奇跡。

浙東的理學和民族革命的中心人物，便是黃宗羲，他在學術上是浙派繼往開來的大師，在反抗異族侵略的鬥爭中，也始終參與其事，要敘述明清之際浙東抗爭的情形，最好是把他作經緯。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東餘姚人，學者稱『南雷先生』，他的身世便是忠烈傳家，父忠端公尊素，以東林耆宿忤魏忠賢，與高攀龍等同時遭害。就在被逮的時候，尊素把宗羲托給他老友劉宗周，這是宗羲從蕺山講學之始。宗羲少年時入京復父仇，以錐刺逆賊之股，孝聲震都下，復在南京和冒辟疆陳貞慧等作留都防亂揭攻訐阮大鍼，也是轟動一時的豪舉。

南京失陷之後，魯王監國于浙東，宗義才開始他對異族抗爭的生命，他以故鄉黃竹浦子弟數百人爲一旅，號『世忠營』，與滿洲兵相周旋，然而那些軍隊都是倉卒編就的，雖然憑着一副忠肝義胆，究不足以當滿洲北方之強，浙東等處，不久就全部淪於敵手，只剩了舟山（定海）一片孤島，作爲魯王駐蹕之地。

正式的戰爭既然勢有未敵，乃化整爲零對滿洲展開游擊戰。那情形古今是相同的，侵略者的兵力只夠佔據幾個『點』，浙東的山野間都佈滿了義兵，結山寨以資攻守。明末著名的忠臣張煌言（蒼水），便是由山寨起而大舉，有過一次使滿洲人驚慌失措的北伐偉績，容後來詳述。

浙東起義的人物，端推『六狂生』，『六狂生』者，毛聚奎，華夏，陸宇燦，張夢錫，董志寧和王家勤，他們奉錢肅樂爲領袖，在邑廟中起義。明僉都御史王翊，所領義兵最盛，和他們相響應。錢肅樂一門忠烈，和其弟肅

圖有圖南之議，航海攻入福建，幹了一番偉大的業績。王翊和六狂生中的五人都在浙東抗爭不屈，被執就義，只有陸宇燝死在最後，他和王翊曾有一段慘厲的事蹟，可見得亡國之慘和遺民對於死節義士的景仰。黃宗羲和全祖望集中，均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大略謂：王翊遭戮後懸首城闕，宇燝思收葬之而不可得，後見有漁人毛明山者，故隸翊部下，亦有同意，乃約錢肅樂部將江漢，趁中秋游人什沓時登城遊覽，至梟懸所，問守卒頭爲誰？卒告以爲翊，漢乃佯怒，謂此我仇人也。拔刀擊之，繩斷墮城下，宇燝與明山即拾之而遁，藏之於家中，襲之以錦，歲時祭奠焉。這樣慘厲悲壯的事蹟，可以見到亡國之淒其，真令後人不堪卒讀。

浙東淪陷後，志士們大都據險要之處，結山寨自守。或往來閩海，以圖匡復，黃宗羲便是這樣的一個要角，據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所言，宗羲且嘗佐慈谿馮京第乞師日本。考明清之際乞師於日本者，最早有舟山總兵崔芝，

後有鄭芝龍，最後乃有馮京第之行，但官私記載，均未及宗羲者，梁任公亦嘗論其誣，這只好算一件疑案。倘宗羲到過日本，則和浙東餘姚朱舜水之乞師不返，明末竟有兩位大儒東渡了。

浙東的抗爭，多數均爲文苑儒林傳中人物，其不能有所成功，自亦意中之事，當時有實力者，惟有王之仁一軍，之仁應魯王之詔，與方國安劃兵守錢塘江，和滿洲大兵相拒有半年之久，不幸以錢塘之天險，竟有水涸可以馬渡之一日；這真所謂天意亡明，之仁也束手無計了。他的死節最慷慨，足以震礫千古，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云：

時王軍乘江守，江廣十餘里，清軍難渡。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汐無潮，試涉僅及馬股。六月一日，清士馬數萬自上岸浮濟，若揭厲然。列戍賊潰。之仁沉家之江寧，見洪承疇稱：『余係明朝大帥，不能沒身波濤，今來投見，要死得明白。』承疇接以禮。命薙髮，不從，殺之。

『自來投見』，可見之仁並不是遭擒獲的了，浙東蕭山徐芳烈（涵之）著浙東紀略一書，記之仁的死節尤虎虎有生氣：

興國公王之仁，號九如，江干事壞，駕船驅家眷入海。穿鱗衣，乘大轎，直入南都，當事使人押，王笑曰：『誰使吾來，吾欲死得明白正大耳！押我何爲？』談笑從容，出入自若，衣冠不薙，有絕命詩兩律。

當時之仁和大學士張國維及方國安共守江干，國安先潰，之仁勸國維引師扈魯王先行，而已以身當之，故不及走，我們倘使要批評他這樣的死法沒有價值，就很不應該了。他的遺詩兩律，慷慨悲歌，大有燕趙俠士之風：

其一

黃沙白浪起狂飆，

力盡錢唐志未消；

半世功名垂馬骨，

全家骨肉付江潮；

詩題四壁生如在，

大笑秋空死亦驕；

三百年來文字重，

祇今惟有霍驃姚。

其二

通濟橋邊獨步時，

國門驚見漢官儀；

欲將鬚髮還千古，

拚取頭顱擲九達；

死後祇應存劍缺，

世間終是有男兒；

瓣香拈起寒霜勁，

白日含愁不敢悲。

我最愛讀忠臣烈士的絕命詩詞，以之爲中華民族品性特色之一，所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而從容就義之頃，更能慷慨悲歌，且不問其詞藻之優劣，真是難之又難的事。這樣從容賦詩授命的舉動，絕非衝動一時的『剖腹』等等行爲所可以比擬，蓋不是涵養有素的人所絕對不易做到，此其所以可貴。張國維爲擁立魯王監國的元勳重臣，兵敗自殺，亦有絕命詩三首，書生所好，結習難除，并錄之：

其一

艱難百戰戴吾君，

拒北辭唐氣若雲；

一去仍爲朱氏鬼，

英靈常伴孝皇陵。

其二

一瞑纖塵不掛胸，

惟哀耄母暮途窮；

仁人錫類應垂澤，

存沒啣恩結草同。

其三

夙訓詩書暫鼓鉦，

而今絕口不談兵；

蒼蒼若肯施存卹，

秉耒全軀答所生。

第一首所謂『辭唐』者，乃魯王監國後，唐王卽位於福州，以叔父的資格遣使令魯王稱藩，國維爲監國大學士，第一反對此舉，以爲『魯唐同宗，無親疏之別，義同舉兵，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

將，須聽命於閩中，其如魯王號令何？」於是斬殺使臣，截掠兵餉，兩朝若相水火，夫以宗室近支，時當大敵，不相戮力同心，反互爲仇視，授人以機會，真是國維生平唯一的憾事，其遺詩所謂『拒北辭唐氣若雲』，『拒唐』一事，在後人看來，總不能不爲之太息耳。

浙東抗滿的戰爭，起事諸人大都出身文士，沒有什麼實力，所以死事儘管激昂，被滿人所剪平也很快。當時知兵事者，惟一王之仁，之仁爲武夫出身，所以能獨拒清師至半年之久。之仁既殉節南京，滿洲便不把浙東放在眼中了。不知在浙東鄞縣的士子羣中，忽然有了一位軍事天才張煌言，以手無寸鐵的書生，竟使滿人措手無策，這也是奇跡了。

煌言字玄著，號蒼水，以舉人擁魯王起義，在魯王初期，他官職卑小，沒有什麼業績足述，他的驚天動地的功勳，乃在於會合鄭成功的北伐，時當順治之季（一六五九），江南久已底定，滿洲統治中國已十餘年，再想不到

漢族還有那麼的力量。

鄭氏的北伐，煌言實爲之謀主，鄭成功所以至今被人所眷念者，煌言的激厲也是主要的原因。鄭氏既興師，煌言亦領偏師出安徽，連下蕪湖太平寧國諸郡，和成功下鎮江後，會師於南京，參謁明太祖孝陵，當時滿洲並未防備，且大軍均在西南，迴師不及，漢族志士，羣起響應，聲勢浩大之至。正可借滿人措手不及的機會，直薄北京，不幸成功被兩江總督卞廷佐所詐敗，煌言亦遁歸。此次漢族處於主動地位的抗爭不成，以後遂永居於被動地位，以至於絕祚。

滿洲經此猝變，乃用清壁堅野的手段，卽東南沿海遷界之舉，來抵制鄭氏。成功亦見事不可爲，乃南圖台灣，以作根本。煌言很不以圖南爲然，幾番與成功書論其得失云：

思明（廈門）者，根柢也，台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

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淹有台灣，亦不免爲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

煌言的意思，是要勸成功進取，不顧勝敗利鈍，但成功不能用其言，煌言知事已不可人爲，乃隱居於懸山島，以候機會。他養有兩猿，能充斥候，故滿人不能獲。後以被其故部所賣遭擒，死節於杭州。

煌言被擒後，和兩件事足述，可見浙東民氣之一般，與夫忠臣義士之流落草澤者之衆多。煌言繫舟中危坐，夜半，篷下有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及渡錢塘，於舟中拾得一箋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也。』

那兩位唱曲送箋的人物，一定是心繫祖國懷念舊物的俠士所作爲，恐怕

煌言投降滿人，故有以激勵之。窺一斑而知全豹，可見清初浙東的民氣了。

煌言的死節，浙人引爲最光輝的事，四明萬斯大（季野先生斯同之長兄）爲之葬於西湖南屏山麓，浙人立祠祭之，黃宗羲爲撰墓誌銘，不但比之宋末的文天祥，且云：『文山從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渡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經營，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以虛喝天下，是公之所處難也。』實不是過份的虛譽，煌言所給予滿洲人的打擊，實較文天祥來得厲害。我以爲明季第一個人物似乎應歸煌言，雖史可法亦不能及，宗羲以史學大師負一代盛名，他的批評當是不虛的。但滿人却想塗抹歷史，在明史中竟不爲煌言立傳，這也可見滿人對煌言之懷恨了。明史雖實亦成於浙東人萬斯同等之手，對於鄉梓先烈似不會處置如此乖疏，然名義上成明史者却是王鴻緒與張廷玉之流，而上面更有玄燁和弘曆兩個主子在，自得隨他們的主意了。煌言遺詩有『忠貞自是

孤臣事，誰望千秋青史傳』之句，早已不希冀置身於異族卵翼下的史傳了。

煌言的遺詩，自被逮迄就義有四首，很傳誦於士庶小民之口，前幾年杭州某扇莊所石印的摺扇，亦有題其遺詩者，可見三百年來忠貞不拔之氣，尚流傳於小民之口，真足爲浙人生色不少，茲全錄之：

## 其一

挪揄一旅尙圖存，  
 吞炭吞甕可共論；  
 敢望臣靡興夏祀，  
 祇憑帝眷答湯孫；  
 衣冠猶帶雲霞色，  
 旌旆仍懸日月痕；  
 贏得孤臣同碩果，  
 也留正氣在乾坤。

## 其二

義幟縱橫二十年，  
 誰知閨位在於闕；  
 桐江空繫嚴光釣，  
 震澤難迴范蠡船；

生比鴻毛還負國，  
忠貞自是孤臣事，

死留碧血欲支天；

誰望千秋青史傳？

其三

國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頭有吾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

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

怒濤何必盡鴟夷。

其四

何事孤臣竟息機？

魯戈不復挽斜暉；

到來晚節慚松柏，

此去清風笑蕨薇；

雙鬢難容五岳住，

一帆仍向十洲歸；

疊山遲死文山早，

青史他年任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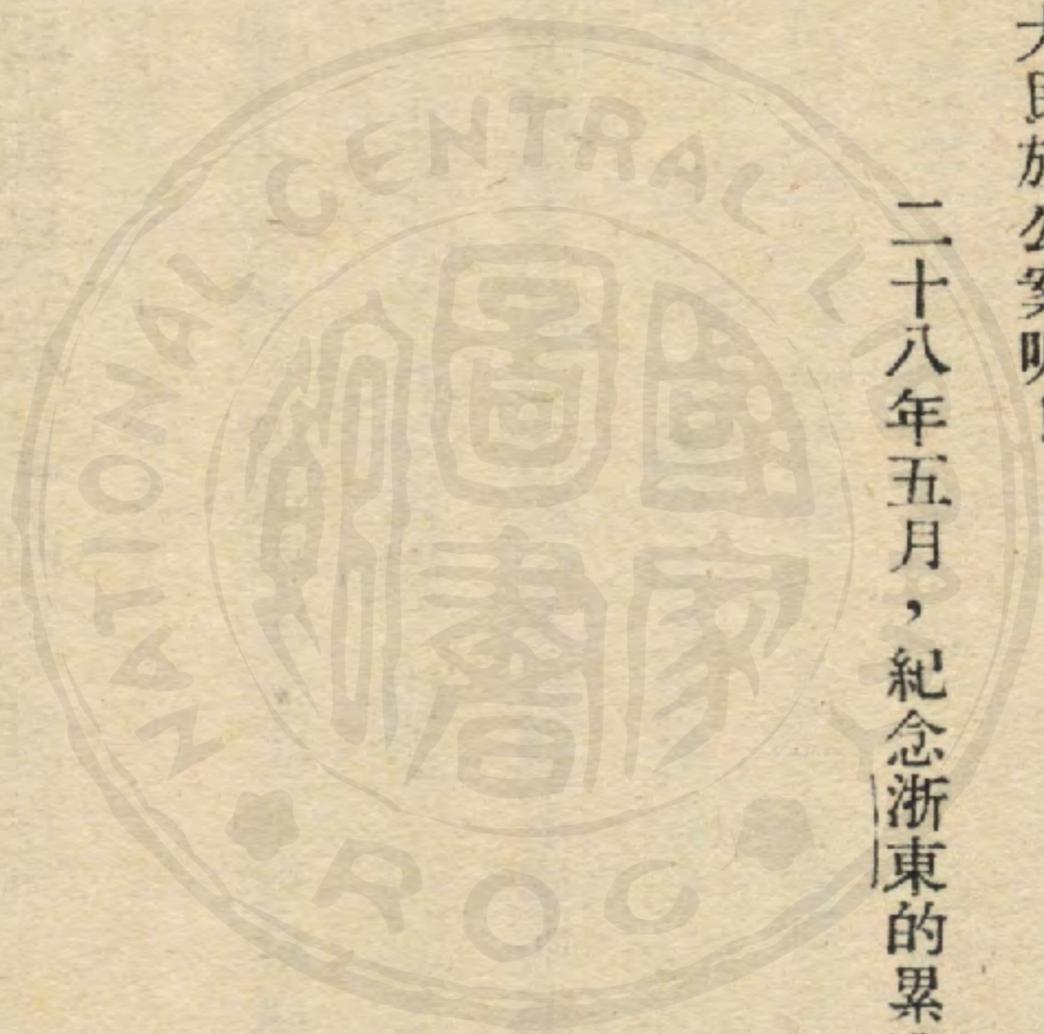
煌言爲浙東抗滿戰爭中最遲死的一人，自他死後，東南已全部底定，山寨的義民組織也消滅殆盡，當時士子身與抗爭的，不是死亡便是隱居終身，或出家做和尚去。只有幾個遺民，荒村窮野之間相遇，共作楚囚之對泣而已。惟有黃宗羲，雖然憂患餘生，還不自甘寂寞，回到四明重倡證人書院，與萬氏兄弟等講學其間。直到文字獄起，浙江停止鄉試旨下，文網更是森嚴，連小小文酒之會也不能夠存在了，宗羲的講學可算得浙東抗滿運動的婪尾。

然而高壓的手段，至多能壓制積極的反抗，對於消極的不合作是無法統治的，所以『博學鴻詞』科的薦舉，原是爲收羅那些遺民而設，浙東文風最盛之區，黃宗羲及萬斯同斯年斯大昆季均爲海內大儒，都以死自持，不肯入網，滿人的狡計於是也窮了。

黃萬諸老的作爲，隱隱然也給浙東士子一個影響，就是大家戒飭子孫不

應試不出仕異族，和滿人不合作，大家務農經商以示抵制。年代一久遠，子孫習其素業，對於祖先的意思忘懷了，却不知道浙東人業游幕和經商之多，有如此的一重偉大民族公案呢！

二十八年五月，紀念浙東的累遭轟炸。



### 清初理學與民族革命的關係

滿洲人統治中國三百年中，文章學術之盛，實超越前代，無論詩、詞、古文、小學、音韻、史學、金石、校勘、輯逸、天算、水利等學，均較前代爲發達，所謂『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實則本學術進化之原則，也並無什麼希奇。清代的學術，豈止漢唐能望其項背而已。

清代學術的發達，和政治很有關係，換一句話說，卽是和民族主義很有關係，要是明清不易代，中國學術史上這樣鉅大的變動是不大會發生的，十七和十八兩世紀的清學必然的還是和明學同一副面型，一定要到十九世紀末葉西學侵入時期才來一個劇烈的變動。因爲明清一經易代，不獨政治版圖變了色，便是清人和明人也完全兩樣；這並不是說清人是薙了髮拖着辮子的而

明人却是帶着方巾的那樣的不同，而是氣質上的互異，說起來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事。

明人是飄逸、不羈和浪漫的，而清人却是拘謹、嚴肅和古典的，在氣質上有了如斯的不同，這不同便影響了他們治學的互異。明代的政治也是專制的，或許較清代更甚，朱明的帝皇，十凶九惡，都殘刻得不近人情的，『瓜蔓抄』，『夷十族』，『廷杖』等等酷刑都是明代創制的，然而政治的嚴威，只及於在朝廷做官的人身上，對於在野的人民，明代是寬容的，徭役既輕，對於士子尤其是特別優待。秀才的尊嚴，更是十足顯示讀書人的地位。於是，一般讀書人，只要不出仕做官，便是『天高皇帝遠』，一切政治上的壓迫都挨不到，由得他們自由逍遙了。

明代士子以不出仕鳴高，便是逃避政治上壓迫的意思，於是在野結交朋友，組織一個社，大家講講學，只要不想推翻皇室，甚至要干涉朝政，官吏

也決不來干預一下。在這樣極端自由之下，明代士子便以朋友爲性命，終身以交遊結社爲事；他們的學業自然受了影響，要他們死下功夫去研討一宗學術是不可能的了，只得把學業建立於聰敏上面。於是分成了兩種人，方巾氣重一些的人，拾宋儒的唾餘，空談性理之學，好聽一些說，這是思想；不客氣的說，便是信口開河，瞎談一陣，一些沒有樸學作根基的，而他們交遊結社所談的，便是一部明儒學案所包括的理學。東林復社一系的士子，大都皆是這一類。

比這一派人飄逸一些的，連那些沒有興趣的理學也不作興談了，只要靠着天賦的聰敏才智，揮筆寫幾篇小品文，也卓然成了大家，這便是晚明文學的成因。他們的生活飄逸、浪漫、不羈，一切都和魏晉人的生活相啣接，文章自然也成了魏晉的風格，結結社，開開會，不涉政治固然清高，要批評一些朝政其實也不妨。文章學業，都是窮苦而後工的，在這樣自由放縱的環境，

肯下死功夫的人自然少了。你想，一個士子今天講觴政茶道，明天挾紅粧遊山，誰還能置身於古紙堆中化三五年功夫整理出一部東西來呢？

這些人物中，於明末看見更多，例如四公子中侯方域冒辟疆之流，雖然才華蓋代，文章絕世，但抹去了他們的聰明和天才，便成了無物了。

清代則不同，政治的壓迫，不獨及於朝臣，連在野的士子也不能放過，明代對於士子是採放任主義的，拘束士子的人不過是學官，芝麻官兒的權力是一向不放在士子眼中的，清代則不然，提督學政的學臣，往往帶着兵部侍郎的兼銜。不獨此也，有時皇帝還直接處理關於士子的事件，却是和放任主義絕對相反的統制主義了。

順治十七年，清廷首下『嚴禁天下士子會盟結社』之令，這便是要把士子關進書房去了，和現代獨裁者要女子回到廚房去一樣的意思。接着文字之獄雷厲風行起來，這是消極的統制，叫士子們不要胡說八道。隨後大開『博

『學鴻詞科』，這是積極的統制，叫士子們循着他的規矩去行事。幾十年這樣統制天下士子政策的推行，便把他們的氣質完全改變過來了。由飄逸不羈浪漫而化成拘謹嚴肅古典的人物，其間潛移默化，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爲功，而是有許許多多血腥腥的事蹟做着基礎的。

清人既不許大規模的講學，又不許私人結社，要敢口出狂言，肆意批評時政得失，腦袋立刻會搬家，而挾妓飲酒那些魏晉士大夫逃避現實的風流勾當，清廷也不許他們這樣做，因爲侵略者的聰慧較司馬氏的帝皇利害多了，決不許他的臣民頹廢消極，因爲他們還掛着一塊『稽古右文』『文治天下』的一塊帝皇招牌呢。於是士子們在沒有辦法之下，漸漸的只得走進書房，置身古紙堆裏度其無可奈何的歲月了。

滿清的統制政策，却造成了學術史上亙古未有的燦爛時代，無怪乎好大喜功之主如乾隆，要自稱『十全』了。清代士子一走進書房，書中自有天地

在，一面既發覺書中蘊藏着無盡的瑰寶，一面也發現許多古人的胡言亂語，由發掘而懷疑，由懷疑而考據整理，各種治學方法和人才均輩出，清代的學術乃盛極一時了。他們書既博覽得多，對於明人的放言高論，自然都看不上眼，故我國治學術史的人都說：清學者，明學之反動也。這句話應用在兩代學術的全貌固然不錯，即使用於各種學術上，也都有存在的價值。

例如上述的晚明文學，一到清代便大為學者所攻擊，紀曉嵐（昀）在四庫全書提要尤為厲害，我對於這種攻擊是同情的，因為晚明文學的產生有他的背景，已如上述；紀昀的攻擊也有他的背景，兩者其實各有自己的立場，以紀昀時代來觀察晚明時代，則後者時代的文學實在不值一擊，原因就是明人的學問靠聰敏和天才而清人靠博聞和疆記。晚明公安竟陵的流派，以我所知，當以清初張山來（潮）的幽夢影為婪尾（尚有清人作續幽夢影，那是狗尾續貂），可見得康熙雍正之朝，晚明文學便絕響了。

至於明人的理學，清人也是反對的，明人的理學，以宋學爲宗，至清人則不屑推崇那些空談性理的程朱，而探根溯源的到兩漢學者，故清代的理學號曰『漢學』。清初學者，不獨攻擊明代理學，而且根本反對『理學』兩字的存在，他以爲理學卽『經學』，捨此無爲理學者，這卽是攻擊宋儒信口空談的一枝實力武器，顧炎武卽是首先發難的人，他與施閏章書說：

『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亭

林文集：與施愚山書）

我之引這一段，並不是在寫『清代學術史』，不過想說明經學和理學在清代是同一的學問，雖然其間是有分野的，而經學和理學兩個名詞是獨立存在的。因此而可將清初許多經學大師和民族革命的關係一併寫在這個題目下

面了。

我在已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已經說明明末士子對於異族的抗爭情形了。那些士子，大都是文苑傳中人物，他們飄逸不羈浪漫的性格，一逢到家國之變，立刻身預鬥爭，殺身成仁而無悔，都是可歌可泣的，一遭失敗，便立即志灰心餒，遁身山林，或爲隱士，或做和尚，所缺乏的是韌性，而儒林傳中的人物，卽是理學中人，他們比較拘謹嚴肅，年事也長，行事比較不同，卽是不敢草率舉事，也不肯中途而退，凡事要幹到不屈不撓，他們的用心苦志，自然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在歷史的光輝上，沒有文苑傳中的人物燦爛而已。

顧炎武既爲有清理學的開山大師，且爲入享兩廡的第一人，當得先從他叙起；炎武，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他三十一歲時便逢到國變，一直到死四十年間，無時不在規復舊物的計劃中，可稱明清之際第一的人物。

他的肆志於家國，乃是受了母親（實是養母）王氏的影響。當清兵下江南日，炎武奉母命避兵常熟，崑山陷，母聞之遂不食，絕粒者十有五日，遺命對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目於地下。』（亭林餘集：先妣王儒人行狀）後來康熙中他的後輩葉方藹（訥菴）和韓菼（慕廬）欲特薦炎武應『博學鴻詞科』，他就有可歌可泣的一段話：

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毋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亭林文集：與葉訥菴書）

當他的母親絕食之前，他正和同鄉友人歸莊（字玄恭，明古文家震川先

生之後，與炎武有『歸奇顧怪』之目，著有萬古愁曲子，最傳誦於世。起義兵抗拒清師，起事倉卒，不足以當大敵，當然是失敗了。後來唐王在福建即位召他，因母喪未滿不赴，待他喪服既滿，南明諸朝，都已遭剪滅殆盡了，這於他是何等傷心。觀他兩年之中，變名易服，三次拜謁明太祖的孝陵，便是眷念故國徐圖光復舊物的表示。據張石洲（穆）撰的亭林先生年譜：於丁酉歲四謁孝陵，次年又五謁孝陵，再次年又六謁孝陵，益可見他之不能去念於故國。石琢堂（韞玉）所稱他『每念故國，發爲詩歌，悲壯激烈』，決不是無病呻吟的了。

炎武的治學，以務實爲本，不尙空疏談論，他的學術，除金石音韻之外，於學幾無所不窺，無所不精，而於地理水利之學，尤爲注意，他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於觀覽史書之外，均從實地考證而來，所謂『周流西者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久而始成』者，其用心之苦，並不是專爲

了著書，不過借著書之名，遍訪天下豪傑，潛觀山川形勢，以爲起事之準備耳。

明亡後圖恢復的志士，當以炎武最爲有作爲，他不獨善於接交天下英俊，且長於理財，隨手千金散盡無吝色，所到一處，便購置妾媵；但一成家室，不一二年卽棄去，這樣詭譎的行事，清人的記載均引爲奇事，雖明知其有所爲而不敢言，實則他暗裏在播散革命的火種啊！

炎武所交友人學侶，亦多瑰奇之士的革命人物，如歸玄恭，陳臥子，夏允彝，閻古古，屈大均等等。炎武雖爲南方人，却愛好北方居住，尤其喜歡關中三秦，謝剛主先生（國禎）云：

蓋關中僻遠，清人勢力尙未能顧及，故明末宗室，及二三遺老，尙得盤遊其間，遯影天涯，是以遠方之士若屈大均顧寧人，皆不遠千里而來，亦卽其因，……及後三藩之亂，吳三桂獨立雲南，王輔臣卽相應於

陝西，蓋與此二三遺老不無相當原因。

這是很見解的話，王輔臣爲吳三桂舊部，以和三桂不洽轉向清廷，當時清帝對他頗施懷柔的功夫，他也感激涕零。後來所以也響應吳三桂者，並不是出於他的本意，乃出於部下的策動，所謂與當時二三遺老不無相當之關係。清初理學名人劉繼莊（獻廷）所著《廣陽雜記》一書，記載王輔臣反清事極詳，可供參考。

清初理學名人在南方者，爲黃梨洲與顧炎武，在西方者爲李二曲，在北方爲孫夏峯，夏峯尤爲巨擘，清初北方的學者，幾無不出他的門下，而他力持清節，不事異族，更爲高超，實爲北方的第一個人物，可當之無愧。

夏峯名奇逢，號鐘元，輝縣人，學者稱『夏峯先生』，少年便慷慨多奇節，最爲後人所稱道的事，便是明季天啓朝營救左光斗魏大中諸公，當魏忠賢氣焰薰天之日，他敢與之抗手，已非旁人所能及了。

清兵入關後，他便身與抗爭，屢次擊退清兵，而附近大邑都已淪陷，他聚集了親友六七百戶，依五公山結堡相守，始終不肯屈服，直至大局已無可爲爲止。

與夏峯同時負盛名者曰鹿江村，江村名伯順，講學於河南，弟子之多，與夏峯相拮抗。清兵入關，守土將吏望風遁逃，伯順本沒有守土的責任，却毅然率領弟子登城守備，和清兵抗衡至七日之久，城陷不屈死。

二曲名顛，陝西之鰲屋人，他本是瘦人子，以苦學成大名，身歷家國之變，遂立志不事異朝，康熙中以隱逸真儒被薦，二曲八上辭牘有云：『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後來大吏固薦，二曲無可奈何，便稱病昇其床至行省，從此絕食六日，甚至拔刀自刺，乃得放還。二曲如此苦心壹志，若非胸中有一點真學問，便萬萬做不到的了。

與二曲情形相同者，尚有傅青主，青主名山，山西陽曲人，他也是王學的流派，以名高被薦，舁牀入京師，堅臥不肯起，乃得放還。

同時浙派的學者，以劉宗周（蕺山）爲宗，黃梨洲爲盟主，我已在關於浙東一文中詳敘過了。

顧炎武黃梨洲王夫之諸儒，他們都抱着首陽之高節，不肯身事異族，於學術上的發揚却是有極大功勳的，比他們後一輩的理學人物，如湯斌李光地陸稼書張伯行之流，便都出仕爲顯宦，而清代的理學，也就一蹶不振了。

廿八年七月十三日

101098520

清 明 集

實價國幣四角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周 黎 庵

發 行 者 宇 宙 風 社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捌拾玖年玖月卅拾日贈





國家圖書館



001708512

# 神州圖書公司

## Sun Chau Book Company

香港威靈頓街六十九號地下

69, WELLINGTON STREET G/F, H. K.

P. O. BOX 16468

TEL: 5-235404

HONG KONG



4:14

籍

K\$